

《城市中国》研究团队最新成果： 《未来社区：城市更新的全球理念与六个样本》

现已在当当、京东、淘宝等平台上架

COMMUNITY
FUTURE
CITY
URBAN RENEWAL



新的挑战和机遇下，城市将如何进化？
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单元，要如何承载人们对未来栖居模式的想象？

存量更新背景下，过往城市建设所导致的大量城市病，正激发着人们对人居环境的再思考。同时，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速迭代，亦引发了一场全球范围内关于未来社区的实践与讨论。本书是《城市中国》研究团队对“未来社区”这一话题的长期跟踪研究。我们以详实的案例和洞察，构建起“未来社区”的理论与实践框架。话题从多角度切入，试图传达一种理解：探讨未来社区，不是对未来图景加以限定，而是以更开放的思维探索城市化的未来。

作者_城市中国 著，崔国 主笔 / 出版社_浙江大学出版社 / 策划方_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 出版时间_2021年8月 / 页数_260页 / 定价_68.00元 / ISBN_978-7-308-19969-8 / 包装_平装双封

扫描二维码
查看城市中国“未来社区”
系列微信文章



读编往来 READER'S MAILBOX

ISSUE 90



读者评论

我只看到了“北京：下班了在出租房里还要继续工作，且背负着买房的梦想”。年轻人何苦为难年轻人？
——歹谷羽 D.Kelly
微信评论 90 期中的《大城市年轻人居住满意度与偏好调查》问卷反馈

“买房的梦想”时代可能要开始被重塑了。
——《城市中国》回复

期待数据精细化管理和防灾调度系统能在近未来最大程度避免城乡内涝水灾这类事故。
——Ting 张婷 微信留言

UGC 的兴盛已严重左右了城市更新的评价标准。栖居的方式不只一种，粗暴的城市化已经将传统生活的神韵碾压殆尽。古建筑、古城、古村落不仅是物质文明的遗存，更凝结着中国人传统的文化精神和生活智慧，从保护到再生，思路的转换也许昭示着现在回头还不晚。
——新浪微博 @自在设计 ZizaiDesign

直观地说，UGC 平台的蓬勃发展，已经严重影响了城市更新的评价标准。有的业主会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我就是要做一个小 x 书打卡爆款风格的咖啡厅。这种趋势也蔓延到了住宅，曾经给地产商住宅样板间设计做咨询，对方发来一堆小 x 书链接让参考。
——新浪微博 @王春或

最害怕的是，我常住地西安，每年都去湖南，我惊奇地发现这两个地方距离千里以上，景点的风格、小区的建筑可谓是一模一样。
——新浪微博 @河东有个小东东

想起了楼下的那条海滩街，起初是一条很平常的小街道，自从老房翻修后，就逐渐衍生出一些网红店铺，这些店铺的消费对周边居民来说是比较高的，但还是有很多人来“网红街”打卡，看着熟悉的老街道变化这么大，还是有些说不出的心情的。
——新浪微博 @机智的二樓

确实如此，很多地方本身有自己的特色，但改造风格却一窝蜂地往“网红打卡地”发展。我家附近一座小山，本有荔科技园且有天然树林，现全部改成种樱花等花树，做玻璃栈道观景台等。深圳南头古城，好久没去，最近去了一次，全是网红风格建筑。也不是丑，但基本失去本来的气质，很可惜。
——新浪微博 @李锦鲤想当女皇

同学的论文就是做的小红书这类媒介和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之间空间生产的关系。我自己也观察到，各种打卡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城市的老旧街道，我将之界定为“网络绅士化”，通过互联网平台而非传统的就业机会吸引临时的流量，从而使得这些老街区有了变化。
——新浪微博 @兰竺鼠放弃在兰陵约会

编辑部联系方式栏



微信公众号: uc_urban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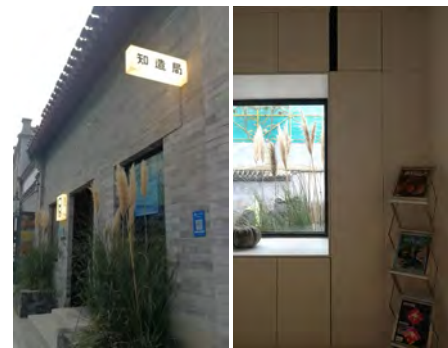


APP: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 城市中国

官方邮箱: 00urbanchina@urbanchina.com.cn
官方网站: http://www.urbanchina.com.cn/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urbanchina/
豆瓣主页: http://douban.com/people/urbanchina/
官方淘宝店: http://urbanchina.taobao.com/(暂停)
发行部电话: 021-65982080-8039
海外观察员项目联系邮箱: cgcuiguo@urbanchina.com.cn

纠错

90 期
1、P8，作者之一奚慧的头衔应为上海同济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城市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读者南曦在北京知造局拍下了偶遇的《城市中国》杂志。

目录

刊首语·Editorial

转型之下规划行业的变化思考

文/匡晓明 [城市中国总编] 006

城市热点·City Hotspots

从上帝视角看城市扩张

文/扬·阿尔蒂斯－贝特朗+法国美好星球基金会 编辑/里斯本

图片提供/新经典文化 008

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

丰宴城市：城市更新博弈下的Smithfield Market

文/李秀政 编辑/张晶轩[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012

编按·Prologue

规划者说：“多规合一”体系下的变革与应对

文/匡晓明 [城市中国总编]+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024

现代城市建设发展谱系

资讯+制图/赵恣+七月合作社

图解参考资料/《现代城市设计理论和方法(第三辑)》王建国著 025

1978年以来城乡建设热潮时序

资讯+制图/赵恣+七月合作社

资讯来源/各大新闻网站,住建部、发改委、农业部官网 026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之下的城市设计思路及发展趋势

文/匡晓明 编辑/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028

超城市尺度的规划

从珠三角城市群到粤港澳大湾区

文/马向明 编辑/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034

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科学方案

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张文忠

采访+编辑/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制图/赵恣 044

主体功能区规划在规划发展中的定位

访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陶岸君

采访/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编辑/山冰沁 056

国土空间规划时代的乡村规划：

从聚焦建设用地走向全域全地类布局优化

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栾峰

采访/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赵恣 编辑+制图/赵恣 062

第一次“设计下乡”中的1958—1976年农村规划

资讯+制图/赵恣

资讯来源/张剑文,“农业学大寨”社会动员背景下的中国新村规划建设·

建筑师[M].2019,(05),90-96

叶露,黄一如.1958-1966年“设计下乡”历程考察及主客体影响分析·

建筑师[M].2017,(06),92 066

规划师的角色适应：从技术到管理角度，

从传统城乡规划到跨专业背景合作

文/邹军 编辑/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072

从借鉴海外蓝图的目标导向，

到解决中国特色城乡发展问题的问题导向

文+图片提供/司马晓 编辑/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078

规划转型，十年后再看县域规划

访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总规划师黄向球

采访/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编辑/赵恣 088

转型背景下，工作在一线

访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张工

采访+编辑/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091

资本整合下的民营规划设计企业

访深圳市城市空间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常务副院长唐曦文

采访/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095

拥抱城市运营时代：一个上市规划公司的二次创业

访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富海

采访+编辑/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101

国际规划设计企业在中国：规划转型中拥抱协作推动创新

访AECOM高级副总裁刘泓志

采访/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编辑/山冰沁 108

国土空间规划信息化的趋势展望

访上海数慧系统技术有限公司总架构师苏乐平、

中台研究部总经理张耘逸

采访/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山冰沁

编辑/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图表来源/上海数慧 118

让国土空间规划下的景观规划为自然说话

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助理教授赵智聪

采访+编辑/山冰沁 130

规划以何为名？

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陈蔚镇

采访/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山冰沁 编辑/山冰沁 136

景观规划应该引领国土空间规划事业的

专业参与实践创新

访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教授李迪华

采访+编辑/山冰沁 图片提供/李迪华 141

旅游规划还有前景吗？

文+图片提供/董观志 编辑/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150

拓展传统城市设计领域中的社区规划

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唐燕

采访/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编辑/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赵恣 160

思想的转变与工具的更新

城市象限CEO茅明睿聊社区规划

采访/佟鑫+宋代伦 图片提供/城市象限 166

将基层规划师行动纳入规划制度体系的北京实践

文/唐燕 编辑/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171

以小见大撬动城市文化

梓耘斋团队谈社区微更新与微空间运营

采访/佟鑫+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图片提供/织城网络 174

广州社区规划的探索成果与未来发展

文+图片提供/袁媛+谭俊杰 编辑/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183

精细化治理和公众参与“双管齐下”的南京社区营造

访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周详

采访+编辑/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图片提供/周详 190

重庆社区规划的2.0思考

访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黄瓴教授

采访+编辑/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图表资讯/黄瓴 196

武汉社区规划的两个阶段

访武汉市新洲区政府副区长祝莹

图片提供/祝莹 采访/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编辑/赵恣 201

发现历史空间的谱系，呈现在地日常的丰饶

访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李昊教授

采访+编辑/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图片提供/李昊 208

珠海参与式社区规划：

城市微更新中“完整社区”的共同缔造

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汕头分院副院长罗赤

图片提供/罗赤 采访+编辑/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214

成都社区生活圈规划：从顶层设计到社区赋能

文+图片提供/姚南 编辑/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222

社区更新的自治意义远大于物质空间改造

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李彦伯

采访+编辑/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图片提供/李彦伯 228

社区基金会参与城市更新的实践可能

文+采访/袁菁 图片提供/张佳华 235

北京德胜城市探索中心的“城市探索”

文+图片提供/宋壮壮 244

黄页 250

转型之下规划行业的变化思考

A Thinking of the Changes in Planning under the Scenario of Planning Transformation

文 / 匡晓明 [城市中国总编]
Text / KUANG Xiaoming[Chief Editor of UrbanChina]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进入下半场，对规划行业的需求发生了由扩张到约束、由增量到存量、由粗放到精细等的变化，从生态城市、人文城市、低碳城市、人民城市、智慧城市等方面对规划师提出了新要求。转型之下，规划人才的培养需要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的知识体系建构、突出城市设计的方法应用，强化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和社会学知识的拓展。存量规划时代，更强调规划师的综合设计能力和在细分领域的专业能力。基于这样的高要求和时代发展的新趋势，原有的收费标准需重新研究，以解决中坚规划师大量承接规划项目的不可持续性，为规划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吸引人才。

规划行业的变化 Changes in the Planning Industry

首先，由扩张到约束。改革开放以来，6亿多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带来城市的扩张，短的时间内侵蚀了大量的生态环境。生态文明时代，城市发展关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入约束发展的阶段，城市规划相应地需要客观理性地对待生态环境。

其次，由增量到存量。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使城市选择了暂别老城、突破新城的发展思路，利用空间换市场的逻辑，

以地生财、滚动发展的增量发展。现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已经过半，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化，城市发展模式由增量转为存量，城市规划需要从新城新区的发展回到城市的有机更新的思路。

再次，由粗放到精细。增量发展相对比较粗放，而存量发展是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进程，需要在有限的土地上精打细算，城市规划需要回归人本尺度和精细化的设计、管理、实施。

对规划师的新要求 New Requirements to Planners

目前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全球语境，以及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响应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思维，对规划师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是生态城市的要求。核心思想是围绕全球语境，探索生态城市的理论、方法和路径。比如生态性城市设计，考虑将城市生态学与城市设计相结合，使传统的城市设计与时代发展相契合。在规划的方法和手段上充分考虑低碳、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加强对生态要素的管控，探索一种将生态、低碳要素纳入控规的方法。

二是人文城市的要求。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是规划师的重要职责，一方面要兼顾保护和创新，另一方面保护和利用相结合，将历史文化的资源价值在规划中进行转换，通过场景营城的方式，既要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也要促进现代消费场景的营造。

三是低碳城市的要求。数据显示，城市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0%左右，城市排放了与能源相关的70%以上的二氧化碳。因此，城市是控制碳排放的主战场。规划师要探索利用城市规划的方法降低碳排放，并对低碳要求进行量化，使量化指标纳入城市规划管控。比如，采用分布式能源落实

节能目标，使每栋建筑都有产生或者收集能源的机会，从而降低传统的能源消耗。

四是人民城市的要求。人民城市要求在不同尺度和层面上关注以人为中心，关注参与式设计和全过程治理。规划师要有产权意识，不仅要广泛采用公共参与，也要探索自治与共治相结合的可持续的规划方式。比如，笔者参与的成都天府新区的总规划师、北京通州副中心的责任规划师，以及上海江浦街道的社区规划师，都是城市共同治理的探索实践。

五是智慧城市的要求。进入大数据时代，城市有了中枢神经系统，新一轮城市规划要在运用好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的同时，与原有的城市规划体系紧密结合。比如，规划师要善于利用一些移动数据来更好地配置城市资源以适应人的需求，同时也要理好线上和线下的关系，积极拓展智慧城市的相关知识。同济大学吴志强院士对智慧城市的研究与实践，值得年轻规划师认真学习。

规划人才培养思路的调整 Adjustment of Planner Education and Cultivation

首先，要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的知识体系建构。按照五级三类的总体架构，进行分层分类的深度研究，以适应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对规划学科的影响。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采用空间规划思路，强调整体协同、纵向传导、横向到边、全域覆盖以及底线思维等内容。

其次，要突出城市设计的方法应用，处理好城镇建设空间、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的关系，共构人与自然和谐的空间生态。同时要认真梳理和识别公共利益，守好底线，这种公共政策的思维，是规划学科和人才培养需要关注的新领域。

再者，增加社会学的知识。“人民城市”关注人的需求，城市更新、社区更新不是简单的解决物质环境的提升问题，而是以此为契机，推动社区具有长期的共治能力和构建社会和谐。所以规划人才培养需要把社会学知识与城市规划学结合起来。

最后，加强计算机技术的应用。科技介入城市规划是必然。美国MIT设立的新城市学专业就体现了这个趋势，城市规划与计算机科学的交叉学科，将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和研究与人文主义、社会创新和政策变化结合起来，其目标是培养本科生在计算机科学、城市规划以及政治决策方面的实践和理论，包括道德与正义、统计学、数据科学、地理空间分析、可视化、机器人学和机器学习等。从业者既不是计算机科学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规划师，而是一类能够利用新工具和新方法来进行城市实践解决城市问题的人。城市规划面向新时代，应该大力加强与计算机科

学的交叉。同时，城市规划学科也面临着自身的科学性问题，逐渐的从感性走向理性，从定性到定量，由原理走向科学。

行业收费标准问题 Problems of Standard Fee in the Industry

城市规划行业目前正在随着社会的进步走向更深的领域，社会对城市规划设计行业的要求越来越高，城市规划工作越来越难。这一点集中表现在综合力和专业力两个方面。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越发强调“多规合一”、多专业的整合，城市规划越来越需要生态学、社会学、经济学和计算机科学等的支撑以及交叉。同时，在由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转变的过程中，更需要规划师的综合设计能力，比如，社区更新规划需要建筑、规划和景观等多专业协同，TOD综合开发项目更需要多单位、多专业、多空间、多内容的协同。笔者在郑州龙湖金融岛项目中担任总设计师，参与了多专业、多单位从前期谋划到导则制定，再到多单位设计，以及设计总控等一系列过程，有效地实现了“多规合一”和多专业协同，也实现了项目的系统性、整体性，改变了以往各自为政，单体拼凑的城市空间组合方式。这都说明了城市规划更加需要综合能力，同时各个专业变得更加专业，在细分领域里都成为更有竞争力的设计团队，说明越是强调综合能力就意味着越强调专业力。

基于这样的高要求和时代发展的新趋势，原有的收费标准不可避免的要被提出来，已经不再适宜目前规划设计行业的发展需求，需要尽快进行调整，这里可以听听《城市中国》读者的声音，主要包含中老年规划师和青年规划师两个读者群。

中老年的规划中坚力量，他们具有吃苦的精神和为国家、为人民工作的价值观，往往在公开场合不愿意谈论收费问题，通过加班加点、增加工作量的方式来对冲设计费多年不变的问题，但是大量承接规划项目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会降低单个规划项目的投入时间，同时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粗制滥造，更重要的是这种高负荷的工作，对新一代青年规划人来说难以接受的。从近年来看，很多优秀的规划专业毕业生逐渐远离了规划设计领域。毕业生的去向已经明确的反映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规划设计界的中坚力量退休之后，可能会出现后继乏人的境况。城市规划不仅要面对国家的发展，还要应对各个城市的管理者、决策者，所以既要体现美学，又要体现生态，还要体现人文，更加要强调智慧城市。这一切都需要汇聚更多优秀的青年人进入这一行业。在此，《城市中国》呼吁尽快研究新的收费标准，以适应城市规划行业新的发展趋势和青年规划师的生存，为规划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吸引人才，储备长期发展的动能。☛

从上帝视角看城市扩张

Urban Expan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d

文 / 扬·阿尔蒂斯 - 贝特朗 + 法国美好星球基金会 编辑 / 里斯本 图片提供 / 新经典文化
Text/ Yann Arthus-Bertrand + Fondation GoodPlanet Edit/ Lisbon Image Source / Tinkingdom



《人类的居所：卫星眼中的地球》
作者：[法]扬·阿尔蒂斯 - 贝特朗、法国美好星球基金会著
译者：何润哲
出版社：新经典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21年11月
售价：218元
Espace-Terre. Notre planète vue par les satellites
Author: Yann Arthus-Bertrand, Fondation GoodPlanet
Translator: He Runzhe
Publishing house: Tinkingdom,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Ltd.
Price: RMB 218

如今，地球上有一半人口都生活在城市。城市还在不断扩张，不断侵占自然的领地。随着财富不停地向城市集中，城市消费在全球消费中的占比也越来越大。城市参与塑造了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又成为这种生活方式的象征。在《人类的居所：卫星眼中的地球》中，法国记者、摄影师、纪录片导演、环保活动者扬·阿尔蒂斯 - 贝特朗及其创办的法国美好星球基金会通过航空摄影图片和对这些“上帝视角”图像的解读，来表达对地表人类环境与自然环境关系变化的态度。这本书通过图片来专题性地展示气候变化、地势、森林、污染与治理、城市扩张、种群活动、自然和人为灾害、环境修复等问题，并采访了一系列学者、环境主义者、社会活动家等。

自2007年起，世界上城市人口的数量超过了居住在其余地区的人口之和。1900年，全球城市人口的比例还只有17%。经历了持续整个20世纪的城市化，到2007年时，全球城市人口比例终于跨过了50%的门槛。城市化进程不会在21世纪停下脚步，而发展中国家更将面临着巨变。

年复一年，城市不断扩张，且速度十分可观。城市化比例，也就是城市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目前在以每年1.85%的速度增长，城市占地面积的增速是它的2倍：最近30年内，墨西哥城的面积平均每年扩大7.4%，4倍于其人口增速；在瓦加杜古，城市占地在35年间翻了4倍。

发达国家基本已完成城市化，主流趋势是城市扩张。与人们的既有观念相左的是，在发达国家，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其实在缓慢降低。原因在于，占据了市中心的摩天大楼往往都是办公写字楼，并不住人，一到夜晚就人去楼空；相对应地，郊区住宅则按美国模式越铺越开，一栋栋带花园的独户小楼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建起。私家车随处可见，承担起日常通勤和购物娱乐的交通需求。从土地使用上看，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建设用地越来越多。公路往往会占到城市中15%到20%的面积。就法国而言，这个数值相当于每10年就有约占一个省的土地面积被用于建设。这些土地之前大多都是农田。在全球范围内，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已经侵吞了大约500万公顷的可耕作土地。

发展中国家 Developing Countries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农村人口外流导致了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增加和城市不断扩张。每周，在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有近120万人口从农村来到城市，其中亚洲国家占了88.8万人，非洲国家占了23万。扩张速度最快的大城市有很多位于中国，包括重庆、天津和深圳，这些城市的人口都超过了1000万。名单上还有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和孟加拉国的达卡—后者的人口数从1950年的30万激增到2009年的1400万。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增长和当地的高出生率紧密相关。1975年时，世界上只有东京、纽约和墨西哥城3个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到2010年时，达到千万等级的特大城市已经有21个，其中逾一半都位于发展中国家。

贫民窟与棚户区 Slums and Shantytowns

在不发达国家，由人口激增产生的城市化相当混乱，市内的社会分层触目惊心。干净优雅的富人小区被散落四周的棚户区层层包围。全球共计有超过10亿人口生活在各式各样的贫民区中。不过贫民区也并不全是人们想象的那样，这里还是生活过渡和社会阶层流动的场所。每年有2700万人涌入这里，但人口并非只进不出。过去10年内，有2.27亿人走出了贫民窟，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这些贫民窟形态复杂，处于不断的变化中，还随时可能消失在推土机下，管理起来难度很大。于是，有时人们就使用卫星影像，以便更好地掌握情况，监控其增长势头，并通过建筑物类型估测人口数量，之后观测其发展进程，从而服务于结构性发展的规划和基础服务设施的建立。

更为发达的城市也会利用卫星影像，用来完善土地管理。卫星影像可用来发现违法修建的游泳池和别墅，比如，绿色和平组织就是使用卫星工具发现俄罗斯莫斯科周边森林保护区内非法修建别墅的。

全球影响 Global Impact

过去，城市依靠邻近的乡村来保证食物供给。如今，随着商品流通全球化，城市不再仅与周边地区相接，而是和整个世界互联互通：新鲜蔬果可能来自于大洋彼岸；家具的原材料可能出自非洲，又在亚洲完成组装。如今，城市需要消

耗大量的能源、原材料和食物。以伦敦为例，这座城市需要300倍于其本身的面积，用来满足其日常需求，消解其产生的垃圾和污染。再比如美国的拉斯维加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卫星观测显示，伴随着高尔夫球场和水上娱乐设施的大量修建，这座沙漠中的城市从1972年起就在不断扩大。这样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正给当地的水资源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观测显示，负责给整片区域供水的米德湖（胡佛大坝拦截科罗拉多河形成的人工湖水库）的水位，在过去40年间有了明显下降。

城市群

Urban Agglomerations

大型城市对资源的消耗也能通过卫星观察到。入夜，从数百千米的高空轨道望去，地面上的城市灯火辉煌，人类借千万光点在地球上留下自己的标记。21世纪初，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了一系列从太空拍摄的地球夜景照片。照片上，最为明亮的区域是北美、欧洲以及沿海地区，而非洲和大洋洲的内陆则几乎一片黑暗。

夜间照明的情况直接反映着贫富分化，这样的差距也存在于城市内部。以巴西利亚为例：这是一座在20世纪60年代规划建设的城市，市中心灯火通明，是富人区，四周则是贫民窟，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不同地方的照明也有差别：欧洲的路灯通常是橙黄色，而东京则闪烁着蓝绿色的霓虹。不过，这些肉眼可见的灯光只是能耗的零头：一般来说，照明用电只占建筑用电的3%，超过60%的电力都给了温控系统。这一现象在第一批发射的图像卫星给出的红外图上就已经非常明显了。

过度消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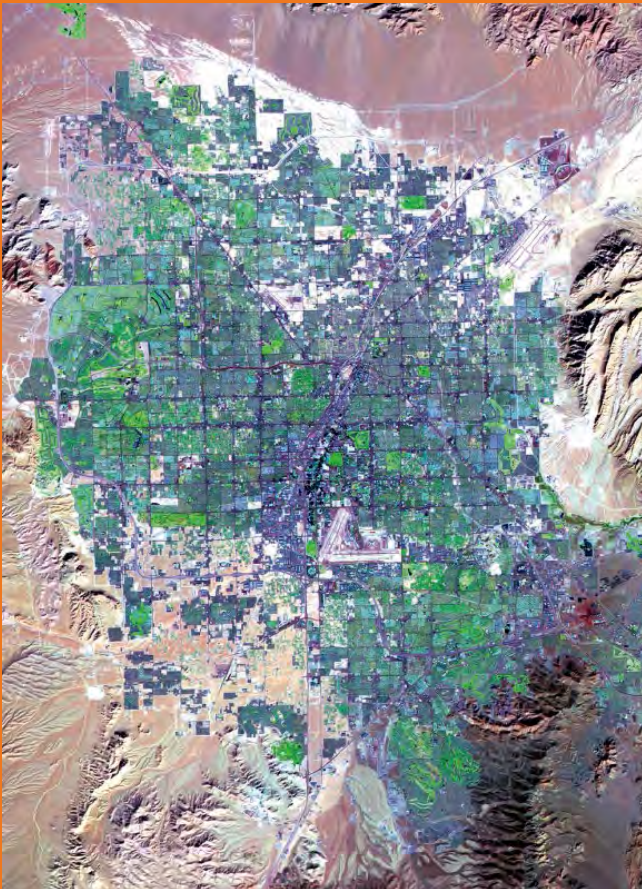
Excessive Consumption

城市化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无论身处何种社会文化，人们对制成品的消费都在不断上涨。顶尖的富豪和最底层的穷人都生活在城市，但城市的形成还是由于中产阶级的增长，这个群体日益壮大，人人都要配备电话、电视、电脑、洗衣机、冰箱……消费者数量的增长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又以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为最。而此种生活方式正在耗尽地球的资源。如今，人类仅1年就要用去1.5倍地球产出的资源，也就是说，人类1年内消耗的资源比地球1年内可产生的资源还多一半。



美国亚利桑那州城市图森
Tucson, Arizona, USA

美墨边境的图森是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人口近100万，墨西哥裔超过30%。从卫星图可以看出图森的典型美式城市规划形态，郊区独栋住宅居民区整整齐齐。



美国内华达州的名城拉斯维加斯
Las Vegas, Nevada, USA

荒漠中的赌城拉斯维加斯有大量绿地，包括各类花园、城市公园、高尔夫球场等，用水需求大，当地政府采取各种手段来约束水资源浪费，包括用仙人掌花园替代草坪等。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Nairobi, Kenya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地势很有特点，由此形成的部分城市区域从卫星上看也是一层层类似梯田的状态。绿洲地带与复杂密集的城市居住区之间也是泾渭分明。



智利瓦尔帕莱索
Valparaiso, Chile

智利第二大城市、第一大港口瓦尔帕莱索位于临海低地，羊肠小道蜿蜒盘绕，数不清的索道把几十座小山连结起来。越富的人住得离海越近，越穷的人住处越靠近山上。

向着可持续城市的方向前进

Towards Sustainable Cities

另一方面，城市中也暗藏着保护环境的契机。人口集中可以提高能源和交通工具的利用效率。此外，建筑业也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潜能最大的行业，其目标为：到2020年减排29%。可以引入某些简明的准则，比如只要选用双层玻璃，就可以把热量散失降低15%到20%；使用感应照明、节能灯泡，合理利用自然光，可以节约75%的家庭照明用电—仅这一项每年就会产生19亿吨的二氧化碳。此外，可以调整电力配输、减少电能损耗的“智能电网”研发工作也在不断推进。得益于无线通信和卫星技术的发展，交通领域也有了可喜的进步。有了全球定位系统，人们能够轻松得知最佳路线，这不仅让出行更加便捷，同时也可以节约能源。

如今，几乎每个人都可以用手机实时获得信息。手机成了我们这些现代流浪者的象征。据统计，截至2011年，世界上每1000人中就有867个拥有手机。

创新

Innovations

城市是文化交流与技术汇集之地，各行各业的人才在这里共聚一堂，无数的创新和探索在此诞生。有时，定位卫星和观测卫星甚至会在出乎意料的地方找到用武之地。比如说，研究者使用“谷歌地球”发现，仅在芝加哥一处，就有大约4500个城市菜园，总面积接近26万平方米，于是便采取措施，帮助菜农更好地打理菜园。还有人借助卫星工具，对美国大城市内来自化石能源燃烧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实时跟踪监控。毫无疑问，高新技术与奇思妙想相结合，还会促成更多利用卫星数据提高城市生活质量的项目，只待落地成形！📍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选摘自书中《城市扩张》章节。）

丰宴城市： 城市更新博弈下的 Smithfield Market

Food City: Smithfield Market Under the Game of Urban Regeneration

文 / 李秀政 编辑 / 张晶轩 [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Text + Image / Li Xiuzheng Edit / ZHANG Jingxuan [UCRC]



李秀政
《城市中国》第五期海外观察员
伦敦大学学院 巴特莱特建成环境学院 建筑城市历史及理论专业 博士研究生在读

随着城市更新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审视以菜市场为代表的日常性城市空间的价值。然而在更新过程中，“网红菜市场”的大肆流行，使菜市场从“脏乱差”的代名词化身为中产阶层的城市情怀，却往往忽略了其日常性背后的利益相关、身份认同，及由此本该存在的博弈。作为伦敦最为古老的肉类生鲜市场，史密斯菲尔德市场 (Smithfield Market) 在伦敦城市更新中引发了多轮不同群体间的博弈，其过程和结果也展现出了对城市生活日常性的谨慎态度。



史密斯菲尔德市场航拍 (图片来源 / Tom Lowe 2020)
Aerial photograph of Smithfield Market (Image source / Tom Lowe 2020)



由画家 Thomas Rowlandson 于 1811 年 1 月绘制的一幅关于史密斯菲尔德露天市场场景的画作 (图片来源 /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A painting of the Smithfield open-air market by painter Thomas Rowlandson, January 1811 (Image source /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民怨四起：从露天市场到固定市场

Complaints From Citizens: From Open-Air Market to Fixed Market

史密斯菲尔德市场 (Smithfield Market) 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外法灵顿区 (Farringdon Without)，是伦敦乃至英国现存的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肉类生鲜市场。该市场作为售卖肉类的场地已经具有超过 800 年的历史，构建了伦敦人关于食物共同的记忆，并成为城市文化符号的重要组成部分。

起初，因其地理位置能够很好地承接从西部的威尔士及北部苏格兰地区被赶来的畜群，史密斯菲尔德市场逐渐发展成为伦敦牲畜交易的露天市场。由于在此进行交易的人数不断上升，开市的频率也越来越大。史密斯菲尔德于 1327 年正式从伦敦市政府获得了国王特许状，成为了合法设置的牲畜市场。工业革命后，随着伦敦城市的快速扩张，原本处于城市西北近郊的市场很快被蔓延的稠密居民区所包围。市场所带来的大量污水、动物粪便、气味等都严重影响了周边居住区的卫生及安全，因此导致了市场同周边居民之间持续并且愈演愈烈的矛盾。

伦敦市政府起初拒绝回应当地居民呼吁迁移市场的请求，但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通过多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愤怒和抗议。当地居民通过长期分发宣传单、向议会和政客施压游说以对环境进行抗议，最终在 1852 年促使议会通过了《史密斯菲尔德市场搬迁法案》，将饲养活牲畜的畜栏转移到了更远的伊斯灵顿区。此后，这一区域一直处于荒废状态，直至 14 年之后，新的市场在这片空地之上重建。

随着伦敦城市人口以及与之对应的市民每日鲜肉需求依旧急剧增加，市议会于 1860 年通过了《伦敦都市肉禽及其他供应市场法案》，筹划在原有的史密斯菲尔德露天市场的基础上建设新的城市中心市场，以同时满足市民对生鲜食物的需求以及周边居民对市场卫生及秩序的要求。新建的史密斯菲尔德市场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于 19 世纪中期修建的中央市场，19 世纪中后期修建并在二战后重建的家禽市场、以及 19 世纪后期分别修建的通用市场、附属市场。市场由 Horace Jones 负责主要设计，先后采用了铸铁及锻铁结构营造大跨度的室内空间，以满足市场日常使用的需求。

新的建筑将之前无序野蛮扩张的露天活畜市场转化为更加便于管理的室内市场，缓和了食物市场与周边居民之间的冲突。在最早的肉类市场建成之后至今的超过 150 年时间里，史密斯菲尔德市场为伦敦市民提供了集中且便捷的食物生鲜资源，并深刻影响了不同角色的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伦敦城市文化与记忆的一部分。

二战期间，由于公共市场相较于周边城市肌理对比过于明显，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德军轰炸的目标。其中有几次对市场及周边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但是史密斯菲尔德市场的主体结构还是比较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在二战之后，史密斯菲尔德市场经历了一系列的修补及更新以对在战争受损的结构进行修复。



Horace Jones主持设计了中央市场和其他的三座市场。最后完工的附属市场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助手建筑师 Andrew Murray 接手继续建造。家禽市场于二十世纪中期连续多次遭遇毁坏之后，由建筑师 T.P. Bennett 设计并重建。(图片来源/ Google Earth)

Horace Jones designed the Central Market and three other markets. The fish market was taken over by his assistant, architect Andrew Murray, after his death. The poultry market was designed and rebuilt by architect T.P. Bennett in the mid-20th century after a series of destruction. (Image source/ Google Earth)



作为主体最早完成的中央市场现为英国二级历史保护建筑。图为 20 世纪初的史密斯菲尔德中央市场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market and completed earliest, central market is now a British grade II historic preservation building. Smithfield Central Marke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mage source/ Getty Images)



1953 年，原本覆盖通用市场中央通高大厅的木制塔状屋顶被替换为了四周环绕高窗的混凝土穹顶，从而为通用市场提供一个更坚固且采光通风性能更好的屋顶。(图片来源/ 伦敦市博物馆)

In 1953, the wooden tower roof that covered the general Market's double-height hall was replaced with a concrete dome surrounded by tall windows, providing a stronger roof with better light and ventilation. (Image source/ City of London Museum)



二战后，史密斯菲尔德市场在其已有的建筑结构上又增设了一系列新的机器设备，例如固定在铸铁桁架下的机械传送装置，其中很多设备迄今仍在继续使用。这一系列改造使史密斯菲尔德市场仍能高效地满足当代的生鲜物流售卖需求，为伦敦市民的日常生活持续提供新鲜的食物。图为史密斯菲尔德肉类市场内的传送装置 (图片来源/ Daniel Avery)

After World War II, Smithfield Market was added a series of new machines to its existing structure, such as mechanical conveyances fixed under cast-iron trusses, which is still in use today. This transformation has enabled Smithfield Market to remain efficient in contemporary fresh food selling, providing a continuous supply of fresh food for londoners. A conveyor inside smithfield's Meat Market (Image source/ Daniel Avery)

拆毁重建：多方抗议下的 Thornfield Properties 提案

Demolish and Rebuild: Thornfield Properties' Proposal under Protes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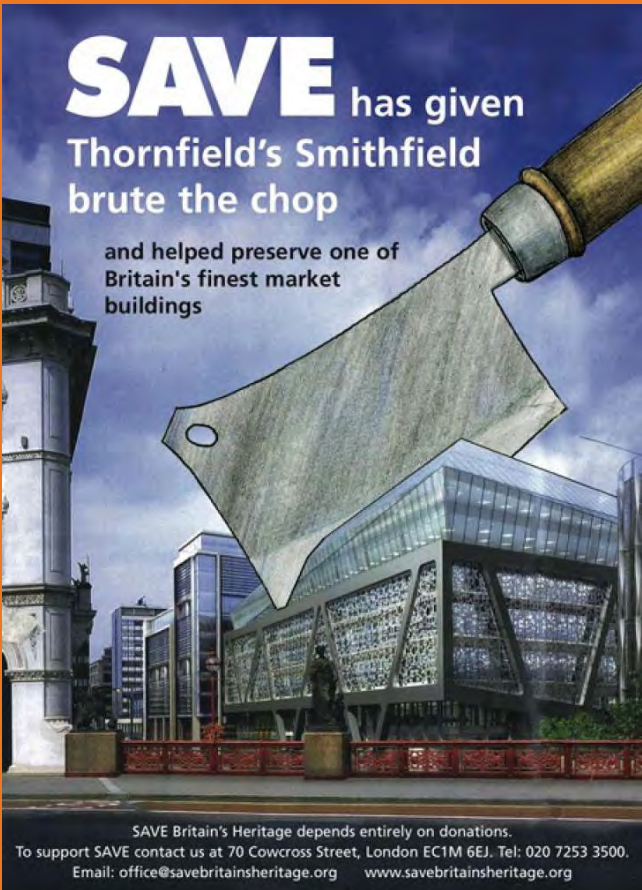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史密斯菲尔德市场因为其规模与历史，成为了市区仅存的一家主要的生鲜批发市场，为市区的肉铺餐厅及个人提供源源不断的生鲜食品。伴随着伦敦城市的快速扩张以及老城区持续的城市更新，周边高涨地价所带来的潜在利润已经逐渐驱使许多老建筑被置换更新，以用于满足新的商业或居住用途。因此，迁移市场并重新开发这一区域所能带来的利益吸引了地产商的注意。

从2005年开始，伦敦市政府开始征集策划对史密斯菲尔德通用市场以及包括鱼类市场及红房子在内的附属市场进行重新开发的提案。地产开发公司 Thornfield Properties 的提案被初步选中。这一提案总投资1.5亿英镑，计划完全拆毁这一部分的市场，在原址之上重新修建一座由KPF设计的7层高现代办公楼，同时将地面层用作零售市场。

然而，这一完全摒弃市场历史与文化价值的提案很快引起了多方人士的抵制与抗议。包括不列颠历史遗产保护组织，英格兰历史遗产组织，维多利亚建筑协会在内的多个公益组织以及包括查尔斯王子在内的王室成员，相关的独立学者，文保及社区管理方面的官员都纷纷发文表示对这一破坏伦敦重要历史建筑的计划表示抗议。

在2004年开发提案被正式提出之前的数年里，尽管有相当多的学者呼吁提名将通用市场及附属市场列为英国历史保护建筑，但是英格兰历史遗产组织始终未将其列入保护名单，理由是通用市场是在建筑师 Horace Jones 去世之后才修工且在二战之后进行了一定修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了对这两座市场的保护抗议中，通过多方的努力，附属市场内的红房子于2005年4月被列入英国二级历史保护建筑名录。

2008年8月，在权衡了多方面诉求的基础上，Thornfield Properties 的开发计划被英国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事务部全面驳回，通用市场及附属市场暂时避免了被完全拆毁的灾难。但是开发商 Thornfield Properties 并没有完全放弃这一地块的重建计划，而是委托新的建筑事务所重新策划了一版方案以试图重新说服公众及相关部门。随着2010年 Thornfield Properties 因经营问题破产，这一提案最终只停留在向当地代表咨询的阶段。



当时由不列颠遗产保护组织策划反对开发商方案的宣传海报：一把大刀架在了KPF为Thornfield Properties设计的史密斯菲尔德通用市场改造方案上（图片来源/不列颠历史遗产保护组织）
The poster against the developer's plans featured a knife at KPF's proposal of The Smithfield General Market for Thornfield Properties (Image source/ Save Britain's Heritage)



一位装扮成屠夫的遗产保护工作者在向路人讲解保护工作。（图片来源/St John Street News）
A preservationist dressed as a butcher explains conservation to passers-by (Image source/ St John Street News)

Henderson Group 提案和历史价值的再认知

Henderson Group's Proposal and the Re-recognition of Historical Value

Thornfield Properties 破产之后，另一家地产开发公司 Henderson Group 很快也对开发史密斯菲尔德市场产生了兴趣。吸取了前者提案的经验教训，Henderson Group 在经过两年的方案研讨之后，于2012年公布了新的开发计划。在这项1.6亿英镑的新方案中，他们宣称将保留并修复通用市场及附属市场现有建筑的外围主要墙体，并将空间开发用于餐厅、零售以及办公，同时在通用市场内修建一个面向公众的新广场。尽管其宣称方案是一种“基于历史保护之上的开发”，但是这种对内部破坏拆除，只保留外立面的方式仍然被很多人质疑或反对。

此过程中，曾经共同抗议2008年Thornfield Properties 提案的学者及学术组织产生了分歧。反对这一方案的学者（如不列颠遗产保护组织的负责人 Marcus Binney），同支持这一方案的学者（如建筑师 John McAslan）等人在多个场合通过演讲、公共展览、撰文等方式进行了激烈的辩论。Marcus Binney 等人认为新方案尽管在努力用历史保护作为一种伪装，尽量避免使用“破坏”“拆除”之类的文字引起公众的警觉，但仍然会对通用市场内部的结构体系造成灾难性的破坏。另一部分在08年同样反对开发方案的组织如英格兰遗产保护组织在这一次则站在了开发商一边，认为新方案并不会对史密斯菲尔德的历史保护街区造成很显著的破坏。

经过新一轮的公众意见调查与相关专家学者的评估之后，该方案仍旧于2014年被官方否决。官方评估后认为，Henderson Group 的新方案虽然关注了市场建筑的外围立面，但仍旧会对市场内部造成巨大破坏。一方面，史密斯菲尔德市场内部建筑结构及空间同样具有很高的历史保护价值，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维多利亚式市场建筑；另一方面，官方开始认同史密斯菲尔德市场群应该被统一保护及再开发，单独对通用市场及附属市场进行重建会破坏整片历史街区的文化价值。

在这过程之中，抗议破坏史密斯菲尔德市场的各类学术及公益组织的建议也获得了官方的关注及认可，即一种“基于平衡不同群体公共利益，确保历史建筑能够长期、可持续的再开发模式”。其中，Marcus Binney 等人与建筑师 John Burell 合作，对通用市场及附属市场进行了详细测绘并在其基础上提交了一份新的提案。其剖面图非常清晰地展现了他们如何在保护绝大部分现存室内外建筑结构的基础上，重新将其打造为一个有活力的城市空间。方案的各类图纸在各类新闻报道中获得了广泛传播，极大影响了公众及政府部门对其观点的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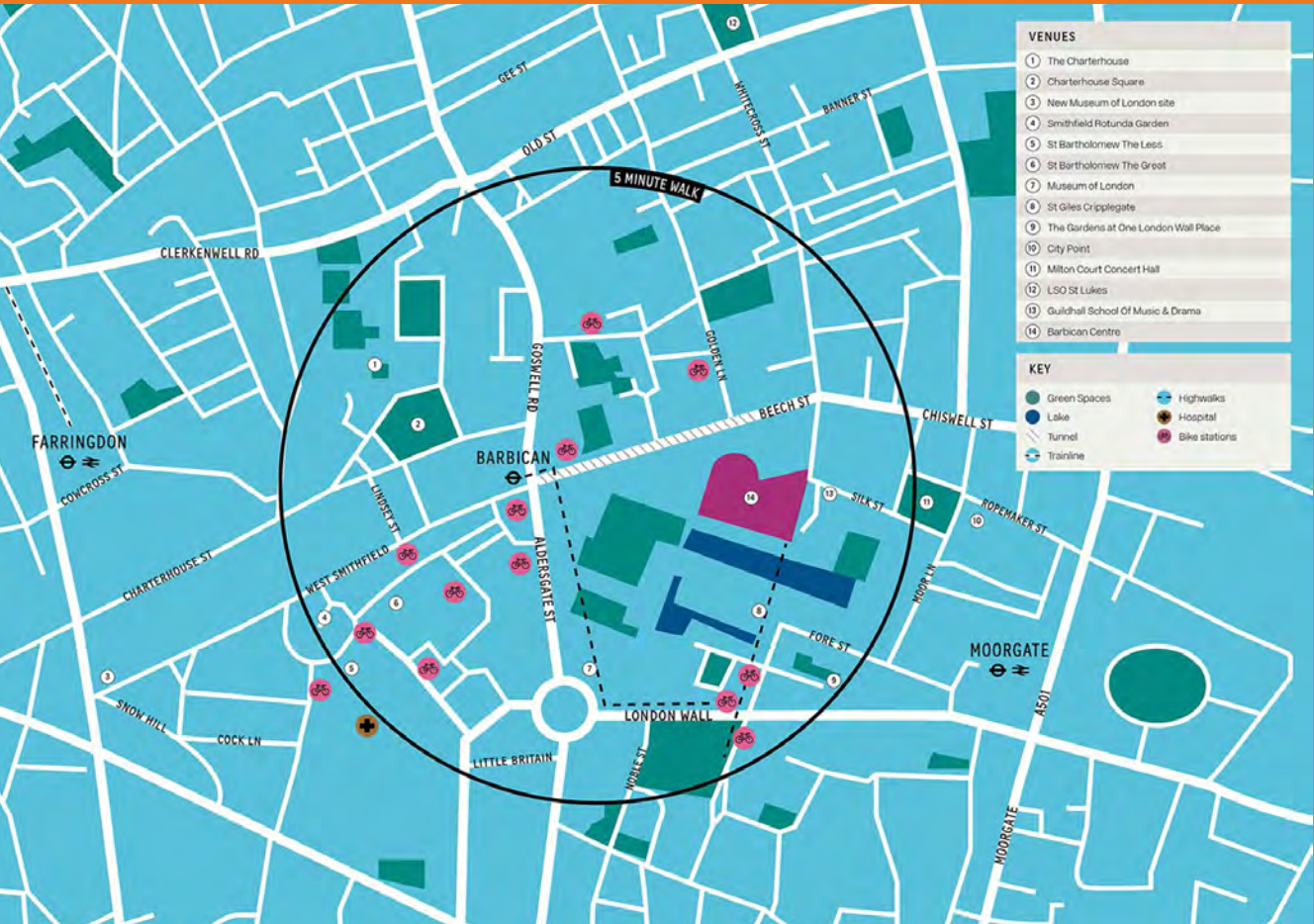
志愿者化妆成 Lady Gaga 在议会大厦前抗议开发商的改造方案 (图片来源/ 不列颠历史遗产保护组织)

Volunteers dressed up as Lady Gaga protest in front of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against the developers' redevelopment plans (Image source/ Save British Heritage)



由不列颠历史遗产保护组织策划, BFF 事务所设计的概念方案, 用于宣传区别于 Henderson 方案的 另一种保护模式, 着重向公众及官方展示存在在最大程度上保留历史建筑并赋予其新功能的解决策 略 (图片来源/BFF Architect)

A proposal designed by BFF architects and developed by British Heritage to promote an alternative model of conservation to Henderson's scheme. The concept focuses on showing the public and authorities that there is a solution that maximises the preservation and functionality of historic buildings (Image source/ BFF Architect)



伦敦“文化一平方英里”规划, 其中西南侧即为史密斯菲尔德市场群项目 (图片来源/ 伦敦市政府)

Smithfield Market Complex on the southwest side of 'Cultural Mile' plan, (Image source/ City of London)

人与地的重新联结：“文化一平方英里” Reconnect People and Place: Cultural Mile

在 Henderson Group 的提案被驳回之后，伦敦市政府开始思考通过改造、建设并组织更多的文化艺术设施及活动来激活在老市中心的历史街区。从 2013 年开始，伦敦市便开始与一系列文化艺术机构诸如伦敦市博物馆、巴比肯艺术中心、伦敦交响乐团以及市政厅音乐及戏剧学院合作，寻求对这一区域进行整体的城市再更新。这一发展策略在 2017 年被官方正式公布并被命名为 Cultural Mile 即“文化一平方英里”。方案包括了对史密斯菲尔德市场群在内的一系列伦敦市中心历史建筑进行改造更新，对各类艺术机构的重新安置及创意文化活动的组织。

2015 年，伦敦市博物馆 (Museum of London) 宣布了将和伦敦市政府合作，投资七千万英镑对史密斯菲尔德西侧市场（即通用市场、附属市场以及家禽市场）进行改造以用作博物馆的新场馆。从博物馆的角度，通用市场将会为博物馆提供将近两倍于之前的展览空间，从而能够展出更多博物馆的藏品并接待更多的游客。

2016 年 2 月，伦敦市博物馆启动了面向全球的建筑竞赛以征集最为合适的改造方案。最终建筑师 Stanton Williams 和 Asif Khan 组成的联合团队被选中主持史密斯菲尔德西侧市场的修复及改建。在他们的获胜方案之中，通用市场及家禽市场的地面建筑由于自身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以及现有结构体系支撑下已有的大跨度室内空间，基本被设计团队全面保留。此外，现阶段基本被荒废破败的市场地下空间也将会被重新修复以提供更多样的地下游览展览空间。

2020 年初，在经过将近半年的方案征集、讨论以及公共意见咨询之后，市政府宣布伦敦本地的建筑事务所 Studio Egret West 被委托负责主持中央市场的改造并协调多个历史建筑遗产保护公司的合作。Studio Egret West 决定继续将食物作为市场更新最核心的主题来构建其设计策略。地面四个大厅周边将布置一系列食物产品的零售亭从而为当地个人或是小规模创业组织提供工作空间。同时建筑师也计划设计地下农场、温室花园、种子银行、食物实验室以及多种影视媒体播放空间以向公众介绍普及创新的食物科技并宣传可持续的饮食生活方式。他们计划让更新之后的史密斯菲尔德重新成为“伦敦市民的食物目的地”。

在不久的将来，史密斯菲尔德市场这座曾经供给了整个伦敦生鲜肉类、历史最为悠久的市场将会转变成为伦敦核心区域内最重要的公共文化艺术中心之一，并将围绕食物产业以多样且新颖的活动与内容向公众传递食物知识，通过食物

为线索重新建立起人们与这片古老市场所承载的历史与记忆之间的连结。

围绕日常性的博弈 Games Around Everyday Life

当我们重新审视前文所总结的与史密斯菲尔德市场建设相关联的几次关键的时间节点与事件，会发现围绕着“买菜”这件基本的日常活动而形成的不同的利益群体在空间生产过程中的博弈、对抗与合作。

在十九世纪中期不同群体间围绕露天市场的对立中，以狄更斯等人为代表的活动家们通过多种媒介表达对政府因为税收原因坚持运行市场而罔顾周边居民生活环境的抗议与抨击，是以往的“沉默大众”基于身体经验的反馈对决定空间生产的不在场的权力结构进行反抗的过程。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常生活中的琐碎、无序被认为是负面的环境因素而受到制度化的“主流”审美所排斥。抗议露天市场运营的团体所批判内容——市场日常环境中的无序、脏乱、令人反感的气味或污水，以及潜在的治安危险等等，本质上也仍是对另一部分人日常生活的批判和压迫，即在早期经常被忽略的牧民、屠宰工人及商贩的生活。

随着人们对世俗日常生活逐渐深入的了解与重视，这种产生于无序中的活力开始被关注。这种活力被认为可以用于抵抗被异化与结构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同时塑造人们对于场地及多元文化的认同感。如今的史密斯菲尔德市场也经常性地各类节日的时候由不同的群体组织多种庆祝活动，吸引了公众参与和以食物为主题的各类活动中。

由于史密斯菲尔德市场的空间形式、社会组织方式同高度商品化的现代超市或卖场不同，其能够包容更多样的售卖方式、承载更多样的公共活动。在日常售卖之外，通过仪式性或庆典性的事件，去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轨迹，实现空间更多元的表现，并形成独特的城市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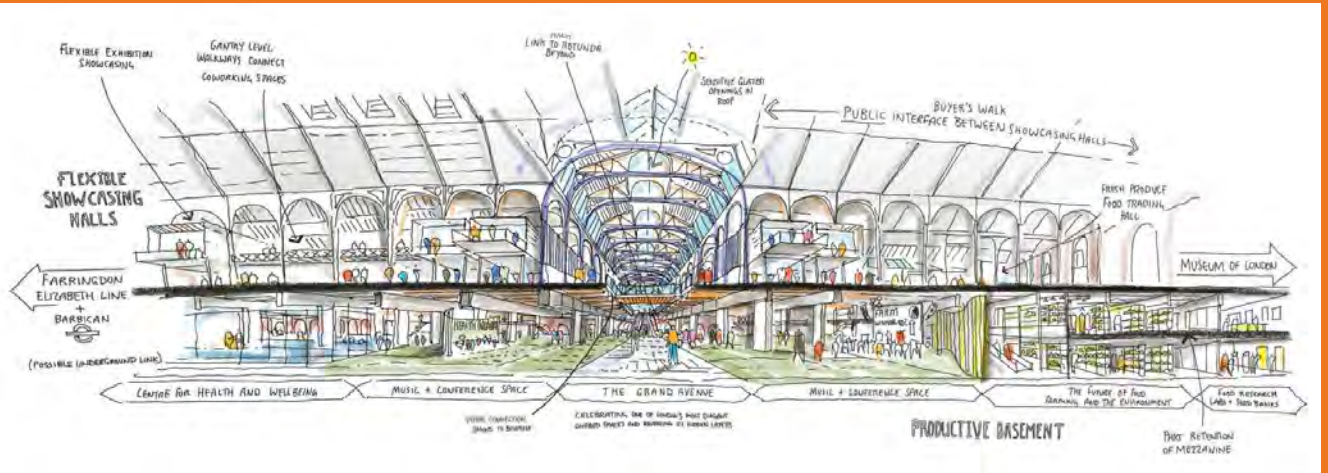
到了 19 世纪中叶，原先史密斯菲尔德露天市场日常售卖活动所形成的不同群体，根据不同的利益诉求进行对抗与协调。最终，由 Horace Jones 设计的市场建筑成为了平衡各方权益的结果。这一过程中，最早由牧民-屠夫-商贩-顾客所形成的基于日常食物需求的基础社会网络，通过对城郊空地进行占有与开发，完成了初始的空间生产。随后，由于空间规模的扩大及持续上升的税收收益，政府部门被纳入到了这一社会网络，通过自上而下的立法管理对空间的再生产进行结构性干预，这一社会网络又同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轨迹产生冲突。



鱼类市场及红房子之间的“铁山”被拆除之后将被设计成公共艺术广场（图片来源/Stanton Williams 事务所）
The 'Iron Mountain' between the fish Market and the Red House will be demolished to transformed into a public art plaza (Image source/ Stanton Williams)



图为描绘 1808 年在史密斯菲尔德举办的巴塞洛缪集市的画作。这一具有七百年历史的集市于 1855 年以“混乱、无序且淫靡”的理由被市议会全面禁止。（图片来源/Thomas Rowlandson）
A painting depicting Bartholomew Fair in Smithfield in 1808. The 700-year-old fair was banned by the city council in 1855 for being "chaotic, disorderly and immoral". (Image source/ Thomas Rowlandson)



Studio Egret West 为史密斯菲尔德中央市场设计的改造方案（图片来源/Studio Egret West）

Studio Egret West's regeneration plan for Smithfield Central Market (Image source/ Studio Egret West)

在这一冲突过程中，作家、记者、艺术家等角色通过史密斯菲尔德市场被连结起来。不同角色的自我表达与交流，最终平衡了各个群体的诉求并决定了新的空间生产决策。其中，建筑师以及其所代表连接的工程技术、材料科学乃至不同国家文化的新网络也被纳入到史密斯菲尔德的空间生产之中。由于当时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并不是建筑设计的主要考量，因此最终市场设计政策的制定完全由政府决策机构主导，设计的表达也更多是基于当时主流且权威性的审美观念。

本世纪初，围绕史密斯菲尔德市场改造与更新所发生的三次主要的活动，同样是由与市场相关联的不同群体基于自己的利益诉求对寻求空间改造的权力进行表达与博弈。最初的改造尝试是伦敦市政府以获取更大经济利益为目的，同地产商进行合作所发起的。一方面，这种决策方式与设计方案完全忽略了周边人群及市场使用者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史密斯菲尔德市场的需求及依赖，势必会引起反对；另一方面，市场构建了许多人共同的记忆与地方认同，其历史价值与 cultural value 拓展了相关者的范围，历史学者、建筑师、遗产保护者以及志愿者们都参与到了空间再生产的讨论和博弈之中，而与他们相关联的价值观念及各类理念也成为了这一网络的一部分。因此，在第一次对史密斯菲尔德西侧市场更新过程中，各类遗产保护组织、知名学者或个人、公众通过一系列在地或线上的活动来征集观点，表达诉求，并最终促使政府驳回了 Thornfield Properties 的提案。

而面对 Henderson Group 的提案，历史遗产保护组织间因观念不同而产生分歧。建筑设计与方案的表达，也成为了各方理念表达、交流与对抗的最为直接且重要的手段。不同群体均委托建筑师通过方案的设计及图像化的表达，向公众展示他们理念下合适的改造方案对民众日常生活方式的影响。最终，从公众平凡但倔强的日常生活出发的方案获得了更多人的支持，阻止了自上而下施加的“制度化的”的空间生产。

在“文化一平方英里”计划和中央市场的改造中，从政府的决策流程、多次对公众意见的征集、方案的及时反馈、建筑师的初版方案，都可以看出对看似碎片化的日常生活模式的关注，尤其是根植于场地的食物文化及记忆的生活节点。与最初的市场设计及之前多版由地产商主导的设计方案相对比，新方案没有再试图用宏大叙事的建筑设计塑造生活模式，而是重现基于日常食物实践的朴实叙事，延续与史密斯菲尔德市场背后的城市文化与食物风俗。

史密斯菲尔德市场多年来的博弈历史和最新的改造方案或许也能激发我们的思考：如何在当代城市更新中抵抗资本的侵蚀？如何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认知、批判与重新构建，在当代城市环境下激活有历史的生鲜市场？如何平衡历史文化价值与现代城市生活方式，赋予其活力与新的功能，为公众提供更为真实的日常生活体验与身份认同？



三次围绕史密斯菲尔德市场改造的讨论与决策过程中不同机构及群体之间的参与 (图片来源/ 自绘)
The participation of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and groups in the three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of Smithfield Market transformation. (Image source/ the author)



每年圣诞前夕的肉类拍卖：各个肉铺为了清空库存，会在这一天面向公众拍卖存储的鲜肉。每年这个时候会有数以千计的人从整个城市赶来，占据市场内外的公共街道或广场，参与到拍卖活动之中，并共同构建了这种基于食物联系的公共文化与记忆。(图片来源/BBC)

The Annual Christmas Eve meat auction: Butcher shops sell their fresh meat to clear their stocks. Every year at this time thousands of people across the city occupy streets and squares in and around the market to participate in the auction which forms collective culture and memory. (Image source/ BBC)



史密斯菲尔德中央市场的街头庆典 (图片来源/Cultural Mile 官网)

Street celebration at the Central Market of Smithfield market (Image source/ Cultural Mile)

规划者说：“多规合一”体系下的变革与应对

Reform and Response under the System of “Multiple Planning Integration”

文/匡晓明 [城市中国总编]+丁馨怡 [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Text/ KUANG Xiaoming[Chief Editor of UrbanChina]+DING Xinyi[UCRC]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从快速增长到趋向更合理的新常态，进入“空间治理”和“生态文明”的双线逻辑。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理，2019年，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在此规划转型之期，本刊聚焦“规划师”群体，来展现“多规合一”体系之下规划领域的变革与应对。

本期课题梳理了现代城市建设发展谱系和1978年以来的城乡建设热潮，对比分析了十年间，大众对城乡规划到国土空间规划变迁的认识。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五级三类”体系以及对空间治理的相关空间规划，根据尺度大小和规划类型出台时间先后，选取了城市群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城市设计、景观规划、旅游规划、乡村规划、社区规划等类型，分别访谈相应规划工作者以及规划信息化工作者，从他们的实际工作和亲身感受出发，来展现过去的空间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在工作内容、方法等方面的不同；通过呈现一线规划师的工作状况，大家在积极地适应。目前各地都在探索通过社区规划师制度、参与式社区规划推进“陪伴式”的社区建设，推动社区向自治的导向发展，同时呼吁构建合理的回报机制，以增强社区更新对人才的吸引力与可持续性，以破除当前存在的社区规划和社区规划师“精英化”的阶段性现象。

通过本期课题研究，希望能为关心空间规划与建设的广大读者理清规划转型的逻辑、具体变化以及行业的应对，同时为当前参与空间规划的广大规划师提供参考和借鉴。改变的是规划体系、规划对象、规划内容、规划传导和管控方式、规划思维，其核心是对未来的国土空间使用进行组织和安排，“规划”的本质没有改变。但是“多规合一”需要多专业、多单位协同，更强调规划师的综合设计能力和在细分领域的专业能力。高要求之下，原有的收费标准需重新研究，以解决中坚规划师大量承接规划项目的不可持续性，为规划

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吸引人才。基于国土空间规划改革底线思维和可控思维，规划工作越来越往“绣花”方向走，规划师角色的重要性在下降，技术权威和技术话语权在弱化，更多的是组织和协调作用。需在此思维框架下调整教学设计，才能接近学生毕业后所面对的现实。城市设计的思维和方法将体现在国土空间规划的各个环节，建议城市设计可以更好地与街区详细规划紧密结合，探索出有利于城市设计落地实施路径，城市总设计师制度是一种实现城市设计全过程管控的重要方式。未来，规划信息化的发展主要在于技术驱动和业务驱动，主阵地寄托于规划设计单位。面对行业转型，民营规划设计企业生存的核心还是服务能力，呈现出的发展趋势是逐渐被大资本整合或者独立上市。由于数据问题、政策问题等导致编制工作频繁的返工和修改，工作量加大，设计费降低，加班频率提高，是一线规划师比较糟心的事情。从城乡规划到国土空间规划，逼迫规划师要学会土地利用思维和方法以及地理信息系统等知识技能，大家也在积极地适应。目前各地都在探索通过社区规划师制度、参与式社区规划推进“陪伴式”的社区建设，推动社区向自治的导向发展，同时呼吁构建合理的回报机制，以增强社区更新对人才的吸引力与可持续性，以破除当前存在的社区规划和社区规划师“精英化”的阶段性现象。

通过本期课题研究，希望能为关心空间规划与建设的广大读者理清规划转型的逻辑、具体变化以及行业的应对，同时为当前参与空间规划的广大规划师提供参考和借鉴。改变的是规划体系、规划对象、规划内容、规划传导和管控方式、规划思维，其核心是对未来的国土空间使用进行组织和安排，“规划”的本质没有改变。但是“多规合一”需要多专业、多单位协同，更强调规划师的综合设计能力和在细分领域的专业能力。高要求之下，原有的收费标准需重新研究，以解决中坚规划师大量承接规划项目的不可持续性，为规划

Modern Urban Construction Theory Development 现代城市建设发展谱系

资讯+制图 / 赵蕊+七月合作社
图解资料参考 / 《现代城市设计理论和方法(第三辑)》王建国 著
Info+Graphic Design/ ZHAO Min + July Cooperative Company
Info Source/ WANG Jianguo, Modern Urban Design Theory and Methods (3rd Edition)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城市规划曾一度以城市设计为主，在 2005 年新规划法颁布之后逐渐向政策管理方向倾斜，十年之后国家领导再度提出“注重城市设计”。部分院校在之后的几年中提出了在原有的建筑、城市规划、景观设计“三足鼎立”的状态下将城市设计设置为一级学科，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本图解展现了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的关系及分野。从这个年表也可以看出，历次工业革命是催生城市空间形态研究和形体取向的直接原因，而后才是政策的完善和城市网络研究（现又增加了经济地理的流动性部分）。而科技的一次次进步也使得关于城市空间和形体的想象成为了一轮轮乌托邦实践，它们或因为一个经济周期的结束而破灭，或与建筑专业融合，让建筑学的发展增加了关于城市、社会和群体研究的层面。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城市建设诸学科在实施层面构成了一个多级递进系统。城市规划的尺度最大，建筑设计的尺度最小，而城市设计是保证两端不至于失调和脱节的中间环节，既帮助规划条款物化和落地，又引导建筑设计有序。三者作为次一级的亚系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用自己的语言说话，按照自身原动力发展自律性，又必须与城市建设这一复合的多元决策做以结构性、总体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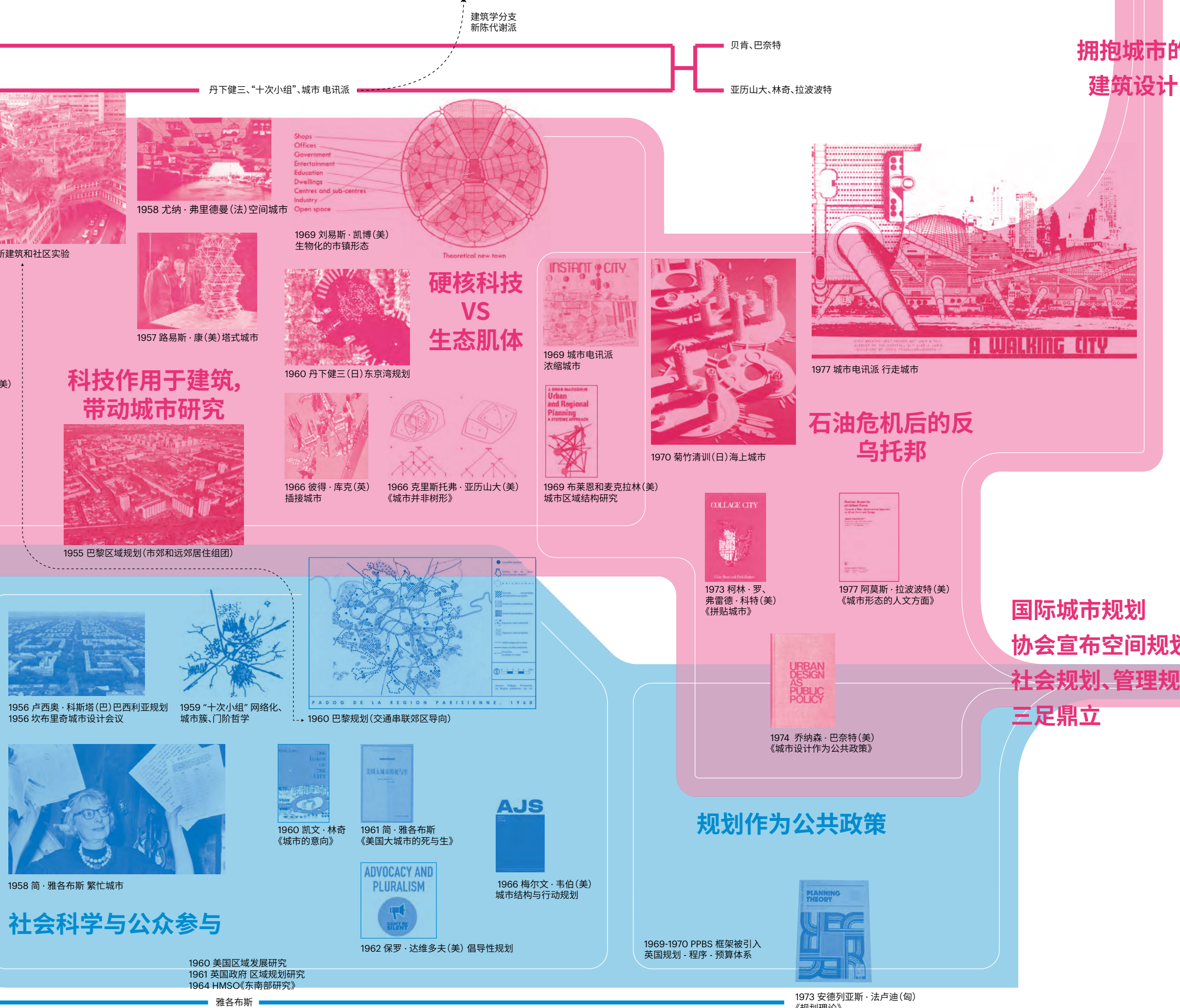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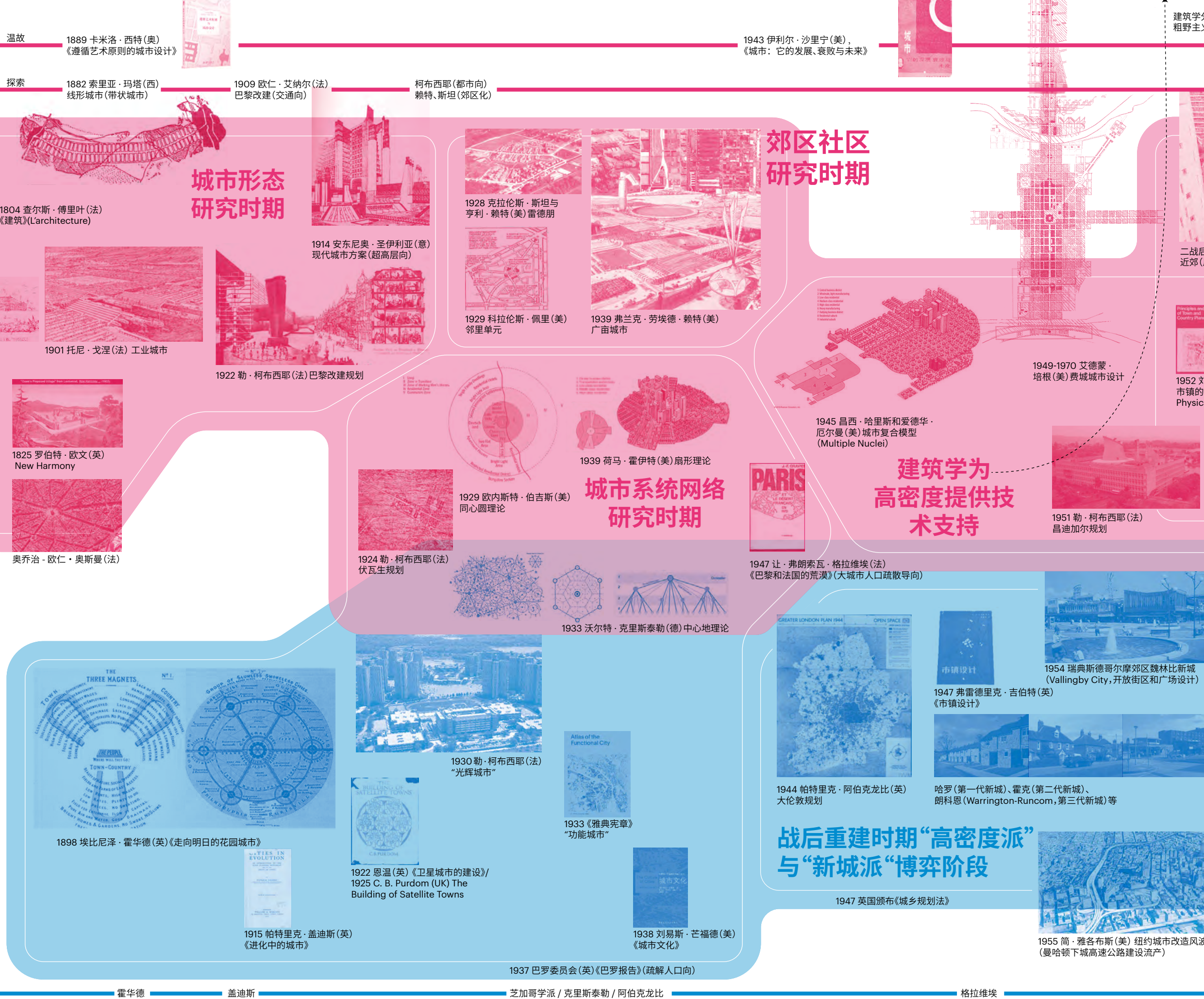
在大数据时代，随着互联网工业革命的下沉，中国再次重视城市设计，这将会为未来的城乡发展和“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带来哪些机遇？

形体规划论

空间形态、形体取向
(城市设计)

复合形态、政策取向
(城市规划)

综合规划论



拥抱城市的
建筑设计

国际城市规划
协会宣布空间规划、
社会规划、管理规划
三足鼎立

规划作为公共政策

社区更新的自治意义远大于物质空间改造
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李彦伯

采访+编辑/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图片提供/李彦伯

常态化的城市发展和治理，需要渐进式、精细化、迭代式的理念。社区规划其实是一个了解我国规划转型的窗口，可以看到城市社会发展与需求的实质。社区更新项目都有着超长的生命周期，长效运维是社区规划的重点，设计只是其中的初始阶段，无论在时长上还是重要性上都非常有限。规划介入社区更新，不只是提出空间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设计宏观的公众参与和管理维护的机制，推动社区向自治的导向发展。在此思维框架下进行教学设计，才能接近学生毕业后所面对的现实；掌握了常态化的城市建设和发展方法论，在面对具体项目时才能从根本出发，从人的需求出发，高校教育才不至沦为空中楼阁。国家发展的大背景在变化，大学教育的侧重也应该随之调整。合理的回报机制将增强社区更新对人才的吸引力与可持续性。

The Significance of Community
Regeneration Lies in Self-governance Rather
than Physical Space Remodeling

Interview with LI Yanbo,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ongji University

Interview+Edit/ DING Xinyi Image Source/ LI Yanbo



李彦伯
工学博士（建筑学），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出站博士后，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研究方向为城市社区可持续发展、历史街区保护与再生、城市合作治理。

Q 谈谈规划专业介入社区更新与其他专业的不同之处？

A 当前各种所谓“城市更新元年”的认定方式不一而足，无论如何，应该看到全国各地近年来都在开展社区更新、社区规划。2019年习总书记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我们在社区更新中讨论最多的就是居民获得感的问题，到底老百姓想要的是什么？政府做什么老百姓才认可？其实答案就藏在问题里面——就是要去问老百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需求是什么？公众参与机制是社区规划的必选项，必须要挖掘公众的需求和意见，更进一步则是让老百姓能够自建自治，能够把居民的力量激发出来，让他们意识到自己与社区的共存共生关系。社区更新是一个盘点、整理、激活、治理的问题，长远的社区规划应该朝自治的导向发展，这是必然的趋势。

现在的情况是虽然是多学科参与社区更新，但是经济学、公共政策、管理学等专业背景真正参与社区规划实践的很少，更多的是在理论的远端进行评论和给出建议。但是建筑师或者设计师介入社区，是为了解决问题，客观上从给出方案到问题的解决实施，问题复杂周期也长。所以目前除了高校的老师和学生研究团队，任何营利性机构做社区规划都难以为继。其实社区规划需要参考很多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比如问卷、田野调查、各类分析问题的方法；但是又要能基于自身学科的应用性特征提出解决方案、规划设计和施工，最终解决问题。但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因为不具备工程项目导向的思维与知识体系，往往只是止步于分析、归纳问题与理论层面的抽象操作。

Q 为什么说空间设计在社区更新项目中并不重要？是基于怎样的语境？

A 社区规划一定是基于自下而上的需求，就像田子坊，虽然现在已经过热，也一直备受讨论，但是到目前为止田子坊还在，房子没有空置的，依然很有活力。比如我们主持的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愚园路四明体育弄的更新项目，核心的功能是活动和晾晒，又在这个上面附加了一个收集雨水的功能，老百姓可以用来浇花，比较环保。但是这个雨水收集功能因为不当使用和维护缺位，坏掉了。所以社区更新不只是规划的问题，真正的动力来自里面的居民。我常说“空间设计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如果纵观长线全周期的更新过程，设计能影响的部分很少且并非核心。作为空间设计来说，四明体育弄已经做到近乎极致的细致了，已经细化到管道里LED灯管的口径大小，间隔多少打透光的孔，孔的大小、倾角、半径等等。设计上已经精确到毫米级别了，施工也做得质量很高。作为社区规划师，以设计而论已经没法做更多了，但是仍然并不能覆盖到大的更新体系里所涉及到的所有的东西。具体到这个项目，截至竣工，成功来自于三方面的精诚合作，缺一不可——一个是街道社发办的主任，有做事情的热情和能力；一个是擅长基层治理的居民区书记，能够调动起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还有当然就是社区规划师，作为衔接各方的枢纽与创意和执行力的源头。但是项目完成以后，后续的运维管理没有即刻衔接，又逢居委会书记退休，社发办主任调离，那么这个项目最初的功能设想自然无法百分百发挥。因此对于常态化、日常性的更新而言，其实最需要培育社区自治的力量。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微更新的小项目，竟然迎来了2.0版本，2021年年底已经完工。四明体育弄公共空间更新的2.0版，并非按原来的方案重新再来一遍，而是彻底更新了思路，构建了一个新的体系，功能不变，仍是活动、遮阳、晾晒、雨水



上海田子坊内景
Interior of Tianzifang in Shangh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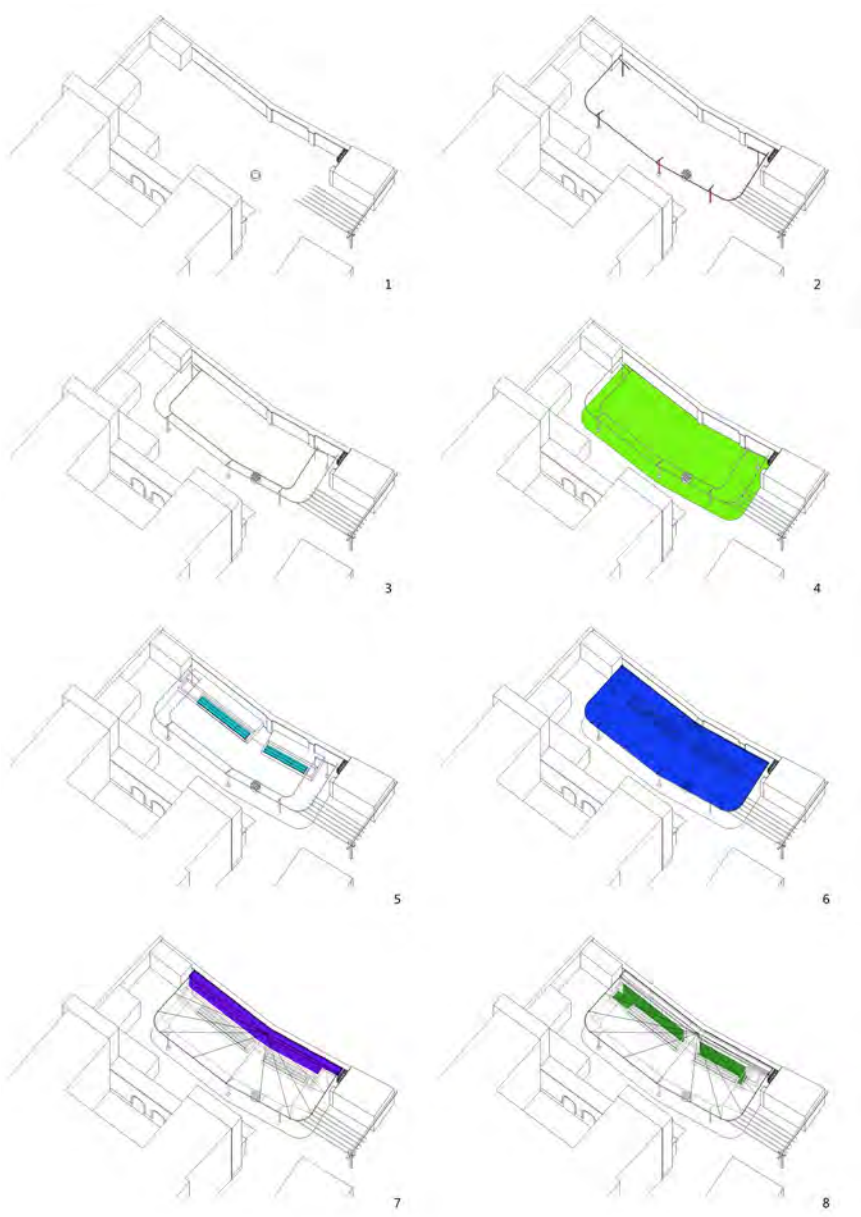
四民体育弄场地更新之前的状态
Simin Tiyu Long Before Renovation



四民体育弄更新项目的起点，居民意见征询会
Beginning of Simin Tiyu Long: Residents Consultation Session

收集，但是运作逻辑、操作方式、使用体验上是全新的，是在原来结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在总体氛围、与环境协调上衔接延续，没有浪费或返工，是名副其实的“微更新的微更新”。2.0版的设计进一步降低了维护需求，并且新的社区领导班子组建了志愿者团队专门负责日常的维护。不断迭代是社区更新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小项目是对可持续、渐进式、精细化的理念的完美诠释，引发了大思考，让我们不断地对社区更新有新的认知。

这个案例也更好地说明了单凭社区规划师的力量，再强也只能跟到施工结束，其实更长的路是后面的自治维护管理。社区更新的内核意义在于自治，而不是物质空间的改造。一定要有治理社区的团队长线跟随，而且必须包括生活在此的居民。他们不应只是在调研和设计方案意见征询和公示阶段参与，更要包含后面的自发管理与维护。社区规划需要从总体上设计公众参与和自治的机制，在某一项目实施之前便考虑到给远期参与管理维护的居民留一个接口，设定一种机制。社区更新重点是社区自治能力的提升，当然不应断章取义地解读“空间设计不重要”的表述，它其实是基于这样的语境。



四民体育弄公共空间更新1.0版复合功能图解
Public Space Renovation version 1.0 at Simin Tiyu Long: Composite Functions



四民体育弄公共空间更新1.0版，后来雨水收集功能因为不当使用和维护缺位而损坏
Public Space Renovation version 1.0 at Simin Tiyu Long: the rainwater collection broke down later due to poor usage and maintenance



四民体育弄公共空间更新2.0版，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全新设计
Public Space Renovation version 2.0 at Simin Tiyu Long: Updates and New Design



四民体育弄公共空间更新2.0版，细部展示（左、右）
Public Space Renovation version 2.0 at Simin Tiyu Long: Details



Q 如何从规划学科的本底来看待转型背景下规划存在的短板？

A 其实这个问题由前辈或专家来回答更合适，我的学养、见识都很有限，这里只能谈点个人愚见。规划其实本应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学科的体系。不过在全国最早设立城市规划系的同济大学，其规划系是从建筑系分离出来的。同济毕业的规划师，尤其年长的一辈都有在建筑系学习的背景，譬如建筑系毕业又去读规划系的研究生。由于正好赶上了中国的建设热潮，他们所学的专业内容，同城镇化的需求非常对口。后来很多学校的规划系建设也都参照了同济的这种模式：即从建筑系分出规划系，或者是基于建筑学的基底和师资力量来打造规划系。现在国内高校的规划学科建设大多是这种模式，在利用制图和模型进行表达的物质空间设计上，优势比较突出。这种空间设计与工程项目导向的教育模式，在国家城市建设需要规划人才的时候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规划和实际的建设落地是对接的，实用效果非常明显。虽然这种模式的效用显著，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比较明显的是，规划带有建筑的基因，某种程度上规划还是过于“像”建筑，尽管拔高到非常宏观的层面，但是在思维上还是基于怎么去塑造或形成一个空间，只不过是怎么样去建造一所房子，变成了安排由许多房子组成的城市。

新世纪前后，规划市场井喷，有建筑师涉足规划领域去承接业务。建筑师在更宏观的层面开展城市实践，似乎也没有那么高的门槛，特别是在详细规划和城市设计领域。但是在总体规划层面，对建筑学而言就比较难了，因为总规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宏观的自上而下的视角。反观全世界的规划教育，并不都是以做模型和画图填色见长的。全世界的规划专业并不尽然是接近建筑学或者建成环境专业设置，反而可能是在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或者公共政策范畴。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对自己的学科特点有一个客观认识，就是它是从建筑学分离出的规划，其带有建筑学的基因，带有建筑学结构性的先在认识，而非一个“天然中性”的学科。所以，培养出的规划师往往有这样的前置条件，所做的规划也更多狭义为空间设计。太受制于固有的基因，太关注于硬件的东西的话，对社会、经济、公共政策等这些方面的敏感度就会不足。

南京大学的规划是地理基底的专业背景，最早是经济地理与城乡区域规划专业，对经济、社会、人口、产业等分析的深度具有特色。但是后来，南京大学的规划又从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分离出来和建筑系归入一个学院了，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强调空间设计方面的重要性。这样的分合过程说明空间设计对于城市规划的重要性。但是从学科的发展来看，与建筑学相比，城市规划更应该跨出空间设计的范畴，因为二者的学科任务本质上是有巨大区别的，最需要补强的是经济、地理、社会、产业等的综合研究，如果在研究生阶段设置一个研究分析类的专业可能会更好。

Q 转型阶段，作为基础教学老师，对学生的专业认识和价值观引导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

A 现在高校教育提倡教学上的大通识、大平台。其实同济大学早就这样实施了，比如说我们的一、二年级长久以来是面对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三个专业的大通识课程。而其他学校也许在一年级就开始分专业学习。我是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的老师，具体是在设计基础教学的教学团队。高等学校有一个“师生比”的要求，即根据教授学生的数量成比例地配备教师，由此一来按照教学规模，我们团队就自然而然成为全学院最大的教学团队，是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这三个一级学科的专业学习启蒙老师。学生入学以后，前1.5或2年是学设计基础，后面才是进入专业化的进阶与强化课程。实际上这两年的基础性通识课程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学生对专业的理解和一些价值观都在前两年形成。这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在课程设置上比较特别的地方。到了大三，学生在专业上已经有一些自己的思考与方法了，因此最初两年在他们学习的初始状态下进行的价值观引导是很重要的。

每个学科都有各自的习惯思维，现代高校的学科划分导致大家都是工具人而非通才，师出于某一个学科背景，自然会按照在这个学科学到的工具标准去生产，按照本学科的方式去思考问题。城市规划师往往是在宏观的上帝视角去看待城市，以至于习惯了自上而下的视角，习惯了对着一个带色块的用地总图来分析城市，这样的工作方式决定了细节往往是难以被顾及的。然而进入存量更新时代，规划师如果用传统的学科方法深入到城市更新、社区营造或者社区规划的层面，所做的规划将会缺失日常细节，远离生活尺度，更不用说对于更加微观的材料和构造的把握了。

社区规划师看似一个职业，其实是一种从事社区赋能的行为活动。社区规划师的角色正可以作为了解规划转型的一个抓手，去回应城市社会发展的实质。作为基础教学的老师，如果新生入学，告诉他们毕业以后等待着他们的还是大量建造厅堂馆所或者新城规划的任务，显然是自欺欺人。其实在他们入学之时，整个社会和建筑规划设计行业都已发生了变化，高速城镇化的“造城时代”已经过去，城市更新已成为新的命题。那么建筑与规划何以自处？老师应该尽早让学生意识到现在学科的发展与挑战已经不是十年前的景象，自然也不能再用十年前的惯性手段去教学生，否则他们所学的知识学到即面临淘汰，与行业发展、时代需求不能接轨。

其实作为相关专业的基础教育工作者，我们也需要过这个坎儿，规划和建筑学的专业课程，与毕业之后的工作有多少是对口的，学科教育要考虑到学生出来之后要做什么，能做什么？是不是会出现“刻舟求剑”的问题，所学的东西到毕业之后已经不适用了。我们不敢说预测未来，但至少现在的行业发展，我们不能接受教授的东西以肉眼所见的趋势过时。

我们教学团队曾在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平行做了两个课题，一个是曹杨新村，一个是虹口港附近的石库门里弄。这两类社区面对的问题完全不同，无法用同一个策略去应对。社区规划更适合一事一议，居民不同，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面对的问题都是特别具体的，很难找到一个制度或是一个教案对所有小区都适应。社区规划的试点小区是街道选定的，但是我们要去考察，看是否具有研究意义，把它当作研究课题来做，而不是传统工程思维下的“一个项目”。社区的问题太多，单一专业的人不可能对应得面面俱到，社区规划师更大的作用是统筹包括管理部门、居民、专业人员等多方利益相关者一起讨论解决问题。于是在真实场景这样的复杂条件下，其实学生能做的工作离真正的“学以致用”还有很大距离，但是参与的这个过程毫无疑问对于他们的学习而言意义重大。

Q 虽然城市发展进入以有机更新为主的阶段，但是社区规划在规划界还是被认为“有些low”，在学校教育中如何引导学生理性看待这个问题？

A 社区规划多是小尺度、适用性、日常性特点，主要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所以社区规划不是宏观的顶层设计，不是抽象的理论模型，也不是时髦的大数据分析，更多的是人文弹性，针对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矛盾，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解决具体的场景、社群下的具体问题。社区规划师的作用是介入物质层面的合理化编织与渐进式生产。

一般而言，高校毕业生都希望能够用自己所学去做惊世骇俗的作品，但是现实是如果以传统的标准来衡量，这样的机会的确越来越少，趋近于无。大部分毕业生或许不愿意去做社区类项目，耗费精力和时间，收入又少，正像您所说的看上去很low。但是这里就存在一个如何定义设计与评价水平的问题。

社区规划的难点在于面对的是业已成型的社会环境和具体的人。一个盘根错节的社会网络已经存在了，包含各种异质性的社群，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所以规划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摸排、深入调研、访谈，了解居民的诉求和意见。相对于狭义的“设计”，有太多更加重要的事情是需要解决的真问题。举个例子——社区规划如果是落地导向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做好施工设计，考虑到如何施工的问题，比如一些干作业、湿作业的区分，降噪等，尽量缩短施工周期、减少施工的开挖造成的对日常生活的干扰。其实社区更新的实质任务，不是一蹴而就的空间设计或者在白纸上肆意挥洒的理想模型，而是连接和梳理一个小社群的生活，它非常考验主持者全面的知识储备、系统的思考方式与灵活的应变能力。和外界固有的想象不同，它不但不简单，反而是非常难的，要求超越单一学科的技术含量。因此一旦做成了，会很有成就感。在切实解决了居民的日常生活问题的同时，会成就设计者所追求的对于一个完整实践系统性控制的力量。所以本身没有low的事情，只有把它做low或者不low的方式。

我们需要看到，能够让社区更新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还是需要大量的相关人才参与。但是阻碍大家进入社区规划领域的并不是因为它繁琐而没人愿意参与，而更多是因为产出和回报的比例严重失衡。现有的社区规划的取费是非常非常低的，可以说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知识和智力的价值被过分低估，那么它的吸引力自然有限。如果能够认识到社区规划工作者的工作价值，对其有较为公正客观的评价，能够有一个健康合理的回报机制，那么就会从教育的根儿上发生转向，包括各个学校对已有专业的重新定义，比如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也会真正强化社区规划的研究方向，甚至有机会开出新的专业，强化社区治理、营造、赋能等方面的特征。因为社区更新的跨专业属性如此明显，毛细血管一样广泛分布的更新需求量又大，学生毕业后何愁不能大显身手，那这个领域自然就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路径。📍

“Urban Exploration” of Beijing Desheng City Exploration Center

Text+Interview/ YUAN Jing Image Source/ ZHANG Jiahua

社区基金会参与城市更新的实践可能

文+采访 / 袁菁 图片提供 / 张佳华

社区基金会能以社区为根，形成一种撬动城市发展的更新力量吗？既有的相关研究和采访显示，尽管上海社区基金会的资金体量增长，运作活跃度增加，但其内部差异较大，以此模式来达成城市更新的星火燎原，恐怕尚不具备广泛的复制性。社区基金会可能仍将在“条块政治”、社会化运作的挑战下不断探索，在法律和规范性文件为保障与激励之下才能获得可持续的健康发展。更长远地来说，它扎根社区、为社区办事的美好前景，只有在整个社会对其理解和认知提高后才能真正到来。

社区基金会能以社区为根，形成一种符合“人民城市”内涵的更新模式，撬动城市的发展吗？

这个疑问来自近年来陆家嘴社区基金会、新华社区基金会、凌云社区基金会等参与到城市更新的实践。他们连接社会力量进行城市更新，完成了诸如社区公共空间（跑道、墙面）、住宅（楼道公共区域、加装电梯等）的设计改造，通过社区营造联动亲子家庭、老龄群体，将多元的研究力量、艺术设计资源导入社区，为社区的未来发展留出了各种可能性。

在研究者唐有财、王小彦、权淑娟看来，2015年《上海社区基金会建设指引（试行）》出台的“政策设计初衷主要是推动街镇层面的公益慈善创新，做大公益蛋糕以及实现公益慈善的在地化，即更多的将本地的公益慈善资源用于本地的社区发展。”

但既有的相关研究和采访显示，尽管上海社区基金会的资金体量增长，运作活跃度增加，但其内部差异较大，以此模式来达成城市更新的星火燎原，恐怕尚不具备广泛的复制性。

社区基金会的运作直接关系到其可持续发展。吴磊教授在其研究文章中指出，社区基金会“通过筹集资金、运作资金来实现组织目标，最大程度地满足捐赠者、社区公众的利益诉求。这种项目运作模式类似于当前我国大力推行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不同的是，购买的主体是社区基金会，可以称之为枢纽社会组织向社会组织的购买。”

在社区基金会的日常运作中，常常会面临更为复杂的问题。

首先是社区基金会在地方治理中的角色定位。简单而言，在社区基金会成为地方治理的协助主体、治理主体并且进一步发挥资金作用的前提下，目前仍主要被视为地方治理的资金蓄水池和社会资源整合机构。

这种“工具化”的操作方法，一方面是社区基金会有较高的专业属性。当基层行政无法应对和负担时，它就可能会成为“包袱”。比如社区基金会在运营上有每年最低支出要求，同时也面临每年审计时不低于原注册资金的要求。如果完不成既定的目标，社区基金会可能面临整改、通报批评等风险。这可能让基层采取不运作，或最低限度地完成指标的工作原则。

社区基金会在实操时，常常还面临与社区营造者相同的“条块政治”困境。它在行政层面属于自治办、社区办条线，社区微更新属于管理办、市政建设条线。但是内容创新的项目一旦落入社区空间时，很难在两种条线中泾渭分明。自治办可能会认为社区基金会的资金、资源流入管理办。如果营造或更新与“儿童友好”挂钩，也可能被认为给“妇联”等部门办事。

作为街道自治办分管的社会组织，社区基金会的日常工作离不开与街道、居委会的互动。比如基金会可以协助后者掌握资金的使用方法，而后者可以在社区层面进行基层协调、动员等事务以达到社区自治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作为基层部门，后者难以从社区管控的行政架构中跳脱出来，任何可能造成不确定的因素，在不同的领导面前也会有所差别。

不少对社区感兴趣的各行业的实践者，即便在获得了一定资金量的支持下，希望推动基层文化创新，最终可能发现自己不太了解“社区”，社区也很“难进入”，大部分的基层管理者更多采取保守应对的状态，因为即便没有“创新”，社区运转如故。

作为新事务，社区基金会的工作充满了创新。社区基金会的秘书长、理事会成员需要有较强的资源链接能力。为了可持续发展，社会化运作下的社区基金会还涉及到运作、筹款等事务。在符合法律的原则下，何时募款、向谁募款、如何募款等充满技术性。中国的大学教育中暂时没有设立这类的知识体系、专业筹款人的认证机制，即便是手持《基金会导论》教材，可能发现在实战中碰壁难免。

以社区基金会为主体，“以社区之名”筹款“行社区之事”，仍是一种相当新式的社区认知概念。普通人对“蓝天下的挚爱”这类救助帮扶类的公募会更为熟悉。因此，社区基金会领导者需要通过“社会营销”（注：运用类似商业上的营销手段达到社会公益的目的；或者运用社会公益价值推广其公益产品或公益服务一种手段）的方式，面向多元化的对象进行“募款叙事”，传达理念，让人们逐步认可这个事情。

社区是在地居民、商家天然的“根”，当社区基金会与居委会联合劝募时，更容易发动。但是募款的门槛、效率并不均衡。不少跨国企业、央企、国企已有固定的慈善组织合作方，这类企业的科层化倾向明显，募款关键人物的寻找颇费周折。

人们可能寄望于区级或社区型商业与社区基金会形成联动，但前提是向抱持“地产增值思维”的业主讲清楚商业与社区的互动能带来多少利润、其经济拉动效力几何颇费周章。分散的业主还天然地担心“协商共治”中“约束”大于“振兴”。涉及到社区商业的更新设计还可能涉及到行政程序的协调，时间周期漫长。

更重要的是，社区基金会及其参与的社区培育工作，需要以法律和规范性文件为保障与激励，但目前《上海社区基金会建设指引》尚未修订细则。社区基金会的工作，需要以时间和信任为基础，以社区为单元，实现更多的合作，同时仰赖整个社会对其理解和认知的提高。而通观全国，除了将社区基金会设置在区一级的成都获得了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的强推之外，其他地方的社区基金会或多或少都仍面临可持续难的问题。

Q=城市中国 A=张佳华

Q 2015年，上海市民政局出台《社区基金会建设指引》。对于很多人来说，社区基金会还是一个新的名词，是否能简单介绍一下它在上海的发展、职能范围和现状？

A 自2015年开始，上海的社区基金会由政策主导推动。社区基金会试图回应两个问题。一方面是政府希望发动居民自治，提升社区参与度，集中社区闲散资源。另一方面是以往的公益慈善基金主要用于西部发展等脱贫攻坚类，设立社区基金会可以有一部分公益资金进入本地社区。社区基金会的业务范围很广，它参与到弱势群体保障、青少年助学、老年人助餐，以及社区提升、培育社区组织、公益创投、空间更新、社工策展等等多方面。

从国际上说，中国的社区基金会数量发展快、分布广。《中国社区基金会数据报告》显示，2021年7月目前国内有187家社区基金会。上海有85家，占到45%。2013年，上海成立社区公募基金会——上海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社区基金会在上海实现了15个区全覆盖。在上海现有200多个街镇，社区基金会设置在街道、镇一级。其中徐汇、长宁的社区基金会覆盖所有街道。

Q 社区基金会的资金由谁来商定使用，以及如何使用？

A 社区基金会的资金使用由理事会来商议。理事会的成员构成主要包括党政官员、企业代表、社会知名人士、社区居民等。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商议程序确定后就可以执行。

比如加装电梯有政府补贴、居民出资两部分，但有一些贫困家庭也可以使用社区基金会的资金进行补贴。另外，社区基金会的资金使用还取决于这部分资金是否属于定向募集资金，如果不是定向的话，社区基金会的各类支出都可以使用。

当然，社区基金——即属于各个居民小区的专项基金的资金操作和使用方法有一定的门槛，需要科普和时间。另一个前提是这个“工具”要方便、好用。当时，陆家嘴社区基金会专门派了一位工作人员专门协助使用这个工具，沟通量还是不小的，但确实是给社区发展开辟了渠道。

Q 社区基金会向企业说明“在地社区责任”这个事情复杂吗，募款的难度高吗？

A 2018年，我们跟艺仓美术馆合作，使用其场地，做免费慈善晚会。当时艺仓如果租给品牌方，商业租用价格是很高的。当时，艺仓的艺术总监张熹和独立策展人王南溟一直在从事艺术教育的工作，愿意来推动艺术与社区双向融合的工作。他们希望社区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机构，还给社区展览门票。我们还合作成立艺术公教项目：“公共艺术”教育针对亲子家庭、“社区直通车”是带领老年人去不同的主题展。

但大部分的时候，相关工作还是充满挑战的。社区基金会需要面对各种合作方、募款对象，合作方式、沟通方式以及诉求都很多元。有人重视“陆家嘴”这个有力的关键词，有人认为社区基金会的价值目标跟品牌价值吻合，有些则是信任你这个人。筹款非常不易，但原则上也要从内往外推动。内，就是社区里的重要成员，区域化党建单位、商会、社委会等成员。再往外才是在地的社区企业。

Q 您当时所在的陆家嘴基金会做了不少与空间改造、社区口述等等有关的探索，这一系列工作是如何落地完成的？创新实验室是一个有着怎样诉求的部门？

A 社区基金会希望服务社区和老百姓，开始寻求空间改善的需求。最开始，我们希望社区自己来提案，自主意愿申报，但是需要他们出方案，整体过程比较行政化，渐渐转变成以我们为主体探索的平台，做技术类支持，寻找资源，通过党建联建、社区商业、居民动员等方式筹款；或是做一些协调工作，找施工队，把有资金的项目纳入到惠及居民的项目中去。

探索中，我们逐步确定跟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伍鹏晗老师团队进行长期合作，作为社区规划的参与主体，也与上大美院、同济大学等等联合协作。老师、学生们以崂山一、二、三村、招远新村、东昌新村等社区作为设计课程内容，有些作品参加了“2020城市设计挑战赛”，有两个方案还举行了慈善晚会募款。尽管我们的资金数量不大，但筹款方式是多元的，结合了不同的主题，还与园林公司、社会组织、有机食品公司、福特专业基金等等6个主体组成了一个社区营造专项资金池，起步资金是6万，以此为起始资金，再进行互联网众筹，希望在社区营造上做更多的具体工作。

创新实验室是联合高校，为街道、社委会提供政府决策咨询服务。实验室也提供课题研究资金，比如“浦东家门口服务体系”、小微企业的调研，给研究生提供在社区基金会驻会的工作机会。社区基金会需要不同专业的人员做支撑，让社区项目有阶段性成果，对他们来说是拓展实践和田野的空间，对我们来说也是工作思路的打开。

艺术与社区： 艺术直通车/ 纺织与时尚

“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
广裁衫袖长制裙，金斗熨波刀剪纹。”
——《缵绫》

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将启动一辆
艺术直通车，载着社区居民参观上海
市三大纺织为主题的博物馆和展览，
穿梭在经纬线的艺术之美中。

招募人员
—— 社区缝纫从业人员2人
—— 纺织厂、服装厂、毛巾厂等纺织业相关
离退休人员10人
—— 其他爱好纺织的居民4人

活动时间
2019年4月11日13:00-17:00
报名截止时间 2019年4月7日

活动费用
此次费用由艺仓美术馆艺术教育专项基金全额资助

报名方式
021-68827313/18621127731 殷捷

导览路线
陆家嘴社区基金会(上海市栖霞路崂山五村555号)
—— 上海纺织博物馆
—— 上海纺织服饰博物馆
—— 艺仓美术馆
布料与时尚展览:时尚印迹:从毕加索到安迪·沃霍尔

主办单位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
上海艺仓美术馆

艺仓美术馆
MODERN ART MUSEUM
SHANGHAI

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
Lujiazui Community Foundation

艺仓美术馆艺术教育专项海报
Poster of Art Education at Modern Art Museum Shanghai



1 街区更新-不任意的任意门项目(企业参与建设)
2 街区更新-不任意的任意门项目(韩国学生志愿者)
3 街区更新-不任意的任意门项目(日常使用情况)
4 星梦停车棚竣工
5、6 星梦停车棚展区展

1: Street Renovation: Non-random Anywhere Door (Companies Participated)
2: Street Renovation: Non-random Anywhere Door (Korean Student Volunteers)
3: Street Renovation: Non-random Anywhere Door (Daily Usage)
4: Completion of Xingmeng Parking Lot
5/6: Exhibition at Xingmeng Parking Lot

Q 您在2021城市空间艺术季的“多元主体共创美好街区”论坛上分享实践经验时，提到成功的募款动员之前也有不少“失败”的经验。这些过程带给您怎样的启发？

A 比如，有生命力的项目不应该有重复性资金投入的，那样会很浪费。有些项目做完3-5个月会随着小区居民的使用，发生变化，也有一些破损率。但是，如果这个项目有居民参与和关心，更新就会变得更可持续。居民会让它展现出来一种生命力，可能并不一定那么景观化，但使用者会自发投入，比如种菜、养鱼、养蘑菇、养乌龟，让丝瓜藤蔓攀援而上，这也是一种可持续且有特色的社区场所。

陆家嘴社区基金会也还曾有过一些申请资金支持的尝试，比如向相关部门或资助方申请资金支持，希望在跳操、棋牌、扇子舞等群文内容之外，争取到更多的社区创新内容。这类部门和组织每年有数额不小的资助，应用于社区文化活动。但实操之后发现，对创新型社区活动的想象和接受还需要时间。



街区更新-游乐园更新之前后 Before and After Street Renovation-Fun Park

Q 我们看到在浦东东昌新村的停车棚里有“三星堆”展览，在不影响居民停车的情况下，联动了周边学校学生、社区志愿者，有一种非常出色的日常感与艺术感，这个项目完成得困难吗？

A 其实有不少难度的。我们自己寻找资金、募款，把一些博物馆的优质资源导入社区，从基础性工作开始做，一次次做导览，培养居民志愿者等等，确实蛮辛苦的。三星堆展览和龙门石窟的展览，是上海大学博物馆和艺术家王南溟老师参与支持、资助。东昌大楼的“楼道美术馆”也是筹款完成的，尽管资金量不大，但也是一种社会化运作。

这种类型的项目，我们会经常碰到“产出在哪”“赢利点怎样”的反问。如果用商业逻辑，你几乎找不到理由去做，用公众筹款也有难度，毕竟它也不是亟需的民生类项目，只是在一个城市的普通社区里做社区美育和群众文化的变革。但是，从国家层面来说，要求博物馆系统配套公教活动，某种程度上，这是把公教延申到了最基层的地方。上海大学博物馆李明斌馆长也认为，这类艺术项目是具有社区治理的溢出效应的。



1 为爱上色-东昌居民演讲介绍为爱上色
2 为爱上色-志愿者活动
3 《晨日摘花》东昌路浦城路墙绘

1: Paint with Love: Dongchang Residents Introduce the Project
2: Volunteer Activities at "Paint with Love"
3: Mural "Morning Flower Picking" at Dongchang Rd and Pucheng Rd

Q 我们在陆家嘴社区基金会官方网站上查到2020年审计报表上有一些“专项基金”。比如福山聚沙专项基金，这是一个怎样性质的基金，是否使用过？

A 福山小区一直有自己的市集和义卖活动，这个基金是在此基础上点滴累计起来的。陆家嘴社区基金会曾针对辖区的31个小区进行科普，每个小区在社区基金会建立了一个专项资金，解决他们的需求。这些需求对于日常来说可能都是很具体的，但是会面临资金短缺或者有资金但有用途限制等情况。居民可以为福山聚沙专项基金自筹，也可以让我们帮忙筹款，决定其钱款的灵活使用。

这笔基金有使用过。福山小区有三栋商品房高楼，小区水管老化漏水。面对这种情况，可以靠物业维修资金来完成，但是当时它的维修资金不够，而漏水这个事情，严重困扰日常生活，不太可能等资金收好再来解决问题。我们就想，可以让这个原本就是由居民出资建立的社区专项基金实现改造。有些居民认为改建的成本相对较高。我们当时结合了“腾讯99公益日”，降低资金，推动了一栋楼的水管改造。

但这事情也有一些可供讨论的方面。民生问题主要还是以政府服务采买为主，社区基金会介入是不是会可行？社区业委会作为社区业主主体，但在水管工程这类牵涉面复杂，需要审价、核验的事务上，人力和专业性很受考验。它与社区基金会的关系和权责应该怎样划分？当然大部分公益组织不会做这类统筹事务。

Q 社区基金会涉及公益慈善、社区事务等各种面向，是不是会碰到在法律条款上明确之处的各种问题？

A 确实，我们需要面临的不只是一些诸如公开募捐的边界和操作不太明晰的问题。2016-2017年，我们的社区基金会做流浪动物的TNR计划（捕捉-绝育-放归），希望让社区流浪猫与居民达成一种平衡，同时也是回应社区居民的一些诉求，但在当时，这一问题究竟是属于“动物救助”还是“文明养宠”的范畴是不明确的，有时也会引发一些质疑的声音。



喵星人TNR计划（社区宣讲、流浪猫户外定时定点投喂区）
TNR Project for Cats: Community Outreach and Outdoor Regular Feeding Area for Stray Cats

Q 在现实中，社区基金会似乎尚未在城市更新形成一种“星火燎原”的态势，从您个人观察来看，挑战在哪里，是否有可复制性？

A 尽管每个街镇都有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大部分会招聘社区工作者承担社区基金会的工作。大部分时候，还是行政化属性较强。在实际工作中，社区基金会做着筹款端和资助端的两项工作。后一种工作主要是因为社区组织培育非常难。在地性是一种生命力。以陆家嘴地区为例，登记的有几十家社会组织，社区类约有10多家，大部分也是政府发起的社会组织。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等专业的毕业生参与社区基金会工作时，也面临着许多困难，比如工作难度和强度较大，而相应的收入还需要有待提高。

在实践中，政府想推动更多的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希望能让有活力的社区项目可复制，但是实际操作下来，复制很难。因为社区基金会需要进行社会化运作，而不是行政化驱动。前者社会化运作就需要专业性，要持续募款，确保可持续性。我们做了一些研究，发现社区基金会在激活不同主体和探索社区自治上确实有一些作用，但是从目前社区基金会的资金体量来看，整体上还是处于非常微小的更新力量。🔴

参考文献：
唐有财，王小彦，权淑娟的《社区基金会的本土实践逻辑、治理结构及其潜在张力》《社会建设》第6卷第1期
吴磊《“合法性—有效性”框架下社区基金会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社会科学辑刊，第2期
范斌，朱志伟《差异性互补：我国社区基金会合法性获取的比较研究——以两个不同类型的社区基金会为例》，《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3期

德胜城市探索中心的种子是在多年前开始播种的。在2012年，我与其他几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好友回到母校——北京市第四中学开设《我们聊建筑》校本选修课，为高一、高二年级的同学们介绍建筑与城市的基本知识。起初，参与这个项目只是出于个人兴趣，但随着项目的持续开展，我们意识到了建筑和城市普及教育的必要性。

让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很大程度上是一些工作中的实际体验。当时，我正以规划师和NGO成员的身份参与几个城市更新项目。城市更新项目往往需要和当地居民频繁沟通，但我在沟通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工作开展不顺利。沟通不畅也不利于居民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当时“公众参与”的概念也开始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讨论。我想，无论是为了促进沟通，还是为了让公众参与更有效，帮助公众建立对城市的基本认识都是有必要的。

于是，我们更尽力地投入到《我们聊建筑》项目中。该项目前后共持续了5年时间，有几十位建筑、规划等专业的学生以教师的身份参与其中，共教授学生近300名。项目最终结束，一方面是因为这件事费时费力，持续地“用爱发电”越发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开始尝试其他的方法。

机缘巧合，我们受邀创作了一本城市科普读物《京城绘1·人来车往》。帝都绘工作室也由此成立，以“帝都绘”微信公众号为主要媒介，用设计的方法阐释城市，并传达给更多人。至今我们仍在这条道路上努力。

无论形式是什么，帝都绘一直以来的目标是一致的——引导更多人理解并喜爱自己的城市。所以，我们也会观察身边的各种案例，看还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其中一类重要的案例，是“城市博物馆”。这种博物馆在很多国外城市存在，如纽约、西雅图、阿姆斯特丹等，名字往往就是Museum of XXX(城市名)。它们是专门关于这座城市的博物馆，展示内容比国内的首都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综合性博物馆更专注，又比在我国各大城市可见的城市规划展览馆更宽泛。以我的观察，我国的大城市还没有这种“城市博物馆”，帝都绘很想创建一个试试看。

帝都绘是北京一家从事有关城市文化的研究、设计和公众传播的设计工作室，致力于有关城市文化的研究、设计和公众传播。团队的项目涵盖信息可视化设计、城市研究、空间设计、绘本制作及城市科普教育等多个领域。2020年，帝都绘与几家其他机构共同在北京建立了一处线下空间——“德胜城市探索中心”，希望通过设计让更多人认识、理解并喜爱自己生活的地方。

北京德胜城市探索中心的“城市探索”

文+图片提供/宋壮壮



宋壮壮
设计师，帝都绘联合创始人，毕业于哈佛大学和清华大学，曾就职于建筑设计与文物保护领域。

“Urban Exploration” of Beijing Desheng City Exploration Center

Text+Image Source/ SONG Zhuangzhuang



德胜城市探索中心外景
Outdoor Scene of Desheng City Exploration Center



《我们聊建筑》课堂上
“Let's Talk About Architecture” Course in Progress

所以，当帝都绘获得一个机会策划并建立一个有关城市的线下空间时，我们非常兴奋——尽管这个空间的面积非常小。对我们来说，“城市博物馆”仍然是一个抽象概念，需要在有限的空间中去实现。为了确定在这个空间中实现怎样的具体场景，我们再次回顾了过往的工作。

取长补短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在《我们聊建筑》项目阶段，上课很累，每次80分钟的课程结束后，我都会口干舌燥，接下来半天都不想再说话。但我们却又很享受那段时光：不少学生与我们建立了紧密的连结，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也从事了建筑和城市相关工作，甚至加入了帝都绘。我当时最享受的是学生们的提问，中学生的提问，有时非常刁钻，却又充满想象力。那样的问答，对双方理解某个问题都很有帮助。

在帝都绘的自媒体上，一篇文章的阅读量为选修课一个班级学生人数的成千上万倍，但有质量的交流似乎反而变少了。这是媒介的局限——微信公众号等常见的自媒体，更适合单向的信息传播，双向或多向的信息交流却显得乏力。在互动过程里，读者是被动的，只能接受内容创作者处理过的内容，没有深度互动的渠道。而纷杂的网络环境则让人难以像课堂上一样，在一个话题上保持至少几十分钟的专注。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希望这个空间可以让人们主动且深入地探索城市。于是，它被命名为“城市探索中心”。

德胜城市探索中心由众志城市营造促进中心组织，在北京市西城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西城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促进中心支持下，与帝都绘共同发起。帝都绘主要负责空间的内容部分，包括展览和活动的策划、设计。中心的位置非常不错，在北京二环德胜门桥的东南角，属于什刹海街道，毗邻西海，与德胜门相对而望。它的建筑是一座二层小楼，每层面积约70平方米。现阶段仅首层开放，每周开放5天，周二、三闭馆。



《京城绘1·人来车往》页面展示
Select pages in Painting Beijing 1: Urban Traffic



“北京中轴线”主题期间，空间中央的桌子上就是一条中轴线。
During the “Beijing Central Axis” theme, the table in the center of the space becomes the Central Axis.



《中轴线上的建筑》展览期间，展厅墙面上覆满了中轴线建筑的档案袋。
During the exhibition “Buildings on the Axis”, the walls in the exhibition hall were covered with archive bags for buildings on the Central Axis.

以小博大 Throw a Sprat to Catch a Herring

由于场地面积非常小，我们又希望实现前述“主动且深入的探索”，所以德胜城市探索中心在很多方面都与常见的展览空间不太一样。

首先，德胜城市探索中心有更加专注的主题设置。展览和活动以半年至一年的时间为一个周期，在这个周期内，无论活动的形式如何多样，都会紧紧地围绕主题展开。而这个主题会与帝都绘同期进行的出版项目结合，从而保证内容的专业性和持续产出。空间第一年的主题是“北京中轴线”，从2020年9月开馆一直持续到2021年7月。

其次，为了给观众们留出“自主探索”的空间，我们放弃了一般展览中常见的对信息的筛选、编辑和设计，而是尽量呈现足够多的原始信息，如论文、图纸、网页截图等等。在狭小的空间里，非常密集地展示这些原始信息，就让空间产生了档案馆的观感。例如，在“北京中轴线”系列展览第二期《中轴线上的建筑》中，我们选出了258座中轴线沿线上的建筑。为每一座建筑都设置了一个文件袋，里面有相应建筑的图纸、照片、文献、网页截图等信息。所有文件袋都被放置在墙上，读者可以取下自行阅读。尽管展厅只是一个30多平米的小房间，但有的观众会在这里停留一两个小时，甚至多次前来，尽可能更全面地阅读资料。

再次，空间希望在设计上可以更加鼓励互动。室内的主要墙面都被可以涂写的白瓷板覆盖，我们鼓励观众取下白板上的资料仔细阅读，用马克笔写下问题和评论，甚至贡献新的展览内容，把它们贴在板上。

“北京中轴线”系列展览首期《中轴线上的城市》的现场，不太像一个经过充分设计的展览，而更像进行中的工作坊。展览第三期《中轴线上的生活》的主要展示载体是中轴线上的人物形象及故事，我们鼓励观众创建自己的人物形象，分享自己与中轴线的故事，从而直接参与到展览内容的生产中。



《中轴线上的城市》展览期间如同工作坊一样的场景
An workshop-like scene during the exhibition “City on the Axis”



在《中轴线上的人物》展览现场，观众创建自己的人物形象，并添加到展览中。
At the exhibition site of “People on the Central Axis”, the audience create their own characters and add them to the exhibition.



中轴线真北挑战赛
Central Axis True North Challenge



空间中的讲座与对谈
Lectures and Talks

最后，我们还希望提供形式多样的城市探索活动。对于相对传统的讲座、课程类活动，我们力求扩展讲者的专业范畴。关于中轴线，除了建筑、城市规划等关系最近的专业，我们还邀请了历史研究、文物修复、摄影等领域的人士前来分享。与此同时，我们还开发了一些非传统形式的活动。比如，我们与合作伙伴和志愿者们一道，开发了“中轴线真北挑战赛”和“中轴线解谜游戏第一季”，分别用定向越野和解谜游戏的形式，引导公众从不同角度深入地体验城市，也都获得了不错的参与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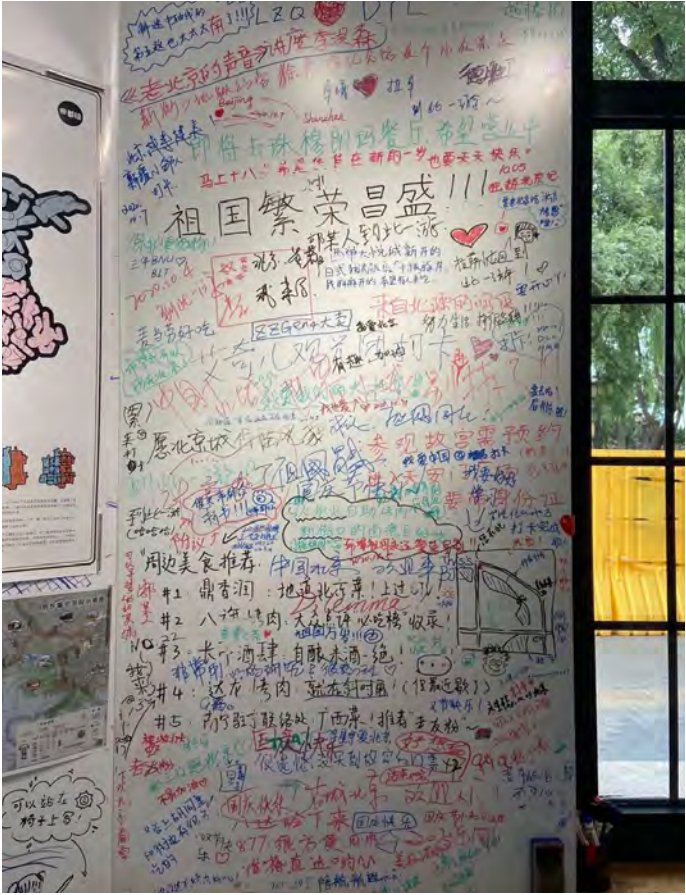
更多思考 More Thinking

德胜城市探索中心还非常年轻，创立以来不过八个多月。对于毫无线下空间运营经验的我们来说，这是密度很高的八个月。一些问题暴露出来，逼迫我们反思自己的做法，乃至初衷。

尽管信息密度很大，但因为空间很小，小到可以一览无余，这让不少观众感到失望。不过，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一定需要大空间呢？前文提到了“城市博物馆”，的确，作为参考对象的博物馆往往规模巨大，但那是唯一的可能性吗？当下，北京的中心城区存在着大量规模不一的闲置空间，把传统的博物馆的概念打散，分解到这些地方，形成网络化的城市文化空间，会不会是对我们所处的城市更新阶段的更好的回应呢？

以往做线上内容时，我们并不知道是谁在以怎样的方式阅读内容，而在线下空间中，则有机会直接观察我们的用户。在空间开放初期，展览、活动吸引来了大量附近的中老年居民，但当他们发现空间里呈现的内容比较陌生时，来得就少了。如今的观众以年轻人为主。尽管帝都绘的各类作品，风格一直都是年轻化的，但当我们在一个老龄化的社区建立线下空间时，是应该保持自己的特征，还是更多地适应本地社区？这是我们仍在思考的问题。事实上，时不时有附近居民进入空间，误以为这是一个关于本地城市规划的展厅，甚至直接询问“要不要拆迁？”针对这一点，我们决定积极回应。在“北京中轴线”专题结束后，我们将会插入一个相对短期的什刹海专题，做个试验，看看空间与社区能否建立更紧密的连接。

刚刚起步的德胜城市探索中心，也还需要展开更多的试验。但就像帝都绘的其他工作一样，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小空间，能让人们更喜欢这座城市。这种追求是不变的。📍



在德胜城市探索中心的三面留言白板墙上，有很多观众为北京写下的寄语。
Messages written by the audience for Beijing on the three whiteboard walls in Desheng City Exploration Center

Reform and Response under the System of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Plan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experienced a transition from rapid growth to a more reasonable “new normal”, entering the dual logic of “spatial governance”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or the spatial governanc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2019, the major function-oriented zone planning, land use planning,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and other spatial planning will be integrated into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In this period of planning transformation, this issue focuses on the “planners” group to show the reform and responses in the planning field under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Plans” system.

This issue has sorted ou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urban construction and the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boom since 1978, and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public's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ges from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to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in the past decade. Combined with the “Five-level and Three-category” system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nd related spatial planning for spatial governance, and according to the scale and the time of their introduction, we selected urban cluster planning, major function-oriented zone planning, territorial spatial master planning, urban design, landscape planning, tourism planning, rural planning, community planning and other types, and interviewed the corresponding planners and ICT infrastructure workers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ir actual work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we show the differences in work content and methods between the past spatial planning and the current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In addition, by illustrating the working conditions of front-line planners, we reveal the need to update the concepts, knowledge structures, and working methods and techniques of planners, and discuss the re-recognition of the identity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planners, the changes in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market, as well as the trends in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industry. Among them, grassroots community planning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is issue, because of its orientation towards urban governance and the equity and efficiency of public service supply. Thus, we made it a separate volume to present the practices and innovations of community planning in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Nanjing, Chongqing, Chengdu, Wuhan, Xi'an and other cities.

By classifying and summarizing the interview data, we concluded that although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Plans” changes the planning system, planning objects, planning contents, transmission and control methods, as well as planning thinking, and its core is to organize and arrange the future use of land and space, the essence of “planning” has not changed. However,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Plans” requires multi-disciplinary and multi-unit collaboration, and places more emphasis on the planners' comprehensive design capabilities 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in specific areas. Under the high requirements, the original fee schedule needs to be re-examined to address the unsustainability of the backbone planners undertaking a large number of planning projects and to attract talent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planning profession. Since the long-term bottom-line thinking and controllable thinking of the reform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planning work is moving more and more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embroidery”. The importance of the role of planners is declining, the technical authority and the voice of technology are weakening, and organ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plays a more important rol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djust the curriculum under the above framework in order to approach the reality that students may face after graduation. Since the thinking and methods of urban design will be reflected in all aspects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it is suggested that urban design can be better integrated with the detailed planning of neighborhoods, and the path conduciv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urban design can be explored. The system of chief urban designer enables to guide and control the whole process in urban design. In the future,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planning will mainly be driven by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and the main position will be placed on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participants. In the face of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the core of survival of private planning and design enterprises is still service capabilities, and the trend is to be gradually integrated by large capital or independently listed. Due to issues caused by data or policy, such as frequent rework and revision of compilation work, increased workload, reduced design fees, and increased frequency of overtime work are some of the worst things for front-line planners. From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to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planners are forced to learn knowledge and skills such as land use concepts and methods, as well a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Currently, the planner group is actively adapting to the transformation. A variety of regions are exploring the promotion of “accompanying”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community planner system and participatory community planning, driving community development towards more autonomy. They call for a reasonable reward mechanism to enhance the attractiveness of community renewal to talents and its sustainability, in order to break the current phenomenon of “elitism” in community planning and community planners.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this issue, we hope to clarify the logic of planning transformation, the specific changes and the industry's responses for readers who are concerned about spatial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hop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large number of planners who are participating in spatial planning.

Ideas and Trends in Urban Design Under th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Text/ KUANG Xiaoming **Edit/** DING Xinyi [UCRC]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urban design is reflected in the aspects of aesthetics, integration, people-oriented, innovation and guidance. Under th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urban design can be better integrated with the detailed control planning of neighborhoods to explore a favorable path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urban design on the ground. It is suggested that urban design should combine control and guidance, and those contents that are bottom-line, basic and involve public interest should be strictly controlled, while those contents beyond the bottom-line should be guided and controlled by means of guidelines. The chief urban designer system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the whole process of urban design guidance and control. Under the goal of “carbon neutrality”, urban design should provide spatial carriers for the use of renewable energy on the one hand, and strengthen the guidance and control on the other hand, so that the total index of “carbon neutrality” can be decomposed into all aspects of construction by using urban design methods to prepare additional ecological and low-carbon plans. In the future, urban design will enter a more organic, dynamic, just and technological stage.

Planning Beyond Municipality Scale: From Urban Agglomeration Planning of Pearl River Delta to Regional Planning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Text/ MA Xiangming **Edit/** DING Xinyi [UCRC]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planning is a type of regional planning. Its basic features are strategic and problem-oriented methods, and its aim is to make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better through appropriate interventions.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 expansion

caused by the high mixture of urban and rural,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and to meet the needs of regional management under the administrative model of “city leads county”, a regional spatial planning focusing on town system planning was carried out in 1989, followed by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 planning studies in 1994, 2004 and 2006 respectively. The early urban agglomeration planning was motivated by the urgent need to establish a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network to meet the trend of urbanization, to stop the loss of arable land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caused by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to alleviate the phenomenon of vicious competition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among cities in the contex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2008, the plan began to focus on the control and governance guidance of regional ecological structure and nodes. The early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mainly relied on administrative means, and legislative and economic means emerged later. The current urban agglomeration planning under th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has made new adjustments in content around innovation leading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Major Function-oriented Zone Planning as a Scientific Strategy of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and Preservation

Oral Account/ ZHANG Wenzhong **Interview+Edit/** DING Xinyi[UCRC]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by focusing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ization and promoting urban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re has been disorderly or even out-of-contro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s land, over-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prominent conflicts betwee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resources. If the social governance capacity is low and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is not sound, especially if the top-down governance is not effective, the feedback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may not only plunge the country into the middle-income trap at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may make it difficult for the country to mainta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the space for food security and ecological safety shrinks. Major Function-oriented Zone planning adopts the method of comprehensive geographic zoning to construct an overall blueprint of the future pattern of rational development, utilization, and prote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land by determining the cor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each geographical unit for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in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such as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areas, and is a strategic, fundamental and binding plan for territorial spatial development.

The Position of Major Function-Oriented Zone Planning in Planning Development

Oral Account/ TAO Anjun **Interview/** DING Xinyi[UCRC]
Edit/ SHAN Bingqin

The major function-oriented zone planning is a product of spatial planning change in China at the top level, as a new type of planning generated by the synergy of various fields in the process of planning transformation, 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planning concept, planning method, planning practice and planning management. The major function-oriented zone strategy expands the perspective of planning from the urban built-up environment to the whole urban and rural space, touching the ecological space and agricultural space, forming the thinking of coordinating urban development with ecological protection, food security guarantee and sustainable use of resources as an organic whole. The major function-oriented zone planning and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re a twin planning methodology.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the major function-oriented zone planning is the most successful and substantial preliminary work.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the major function-oriented zone planning has not only been abolished, but also its importance has been enhanced.

Rural Planning in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Needs to Go from Planning Construction Land towards Coordinating the Whole Region

Oral Account/ LUAN Feng **Interview/** DING Xinyi[UCRC]+ZHAO Min

While urban planning and urban-rural planning were originally focused o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construction land us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is faced with the problem of the overall layout of the whole area and its land use. Planners do not have the knowledge reserve for land types other than construction use, and the discipline knowledge must be expanded and reshaped. However, every planner is not required to master the inherent rules of each land use, but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combination relationship and optimization means among these different land uses. In addition, the change from mainly incremental to renewal of inventory construction land has led to a change in the basic planning methods.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stablished interests largely influences the prepa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n, and it is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prepa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stages as it was done before. At this level, rural planning, community planning and urban renewal planning belong to the same category, which means that they must communicate and coordinate with different interests more often, and this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k for planning practitioners.

The Transformative Role of Planners: From Technical to Governmental, from Traditional Planning to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Text/ ZOU Jun **Edit/** DING Xinyi[UCRC]

From urban planning to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and now to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it is mainly a change in guiding ideology, a so-called correction. In the past,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did not give enough consideration to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the state's control was not enough. The focus of the current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is to better balance construction and protection, to integrate the idea of protection into planning, including the preparation, approval and implementation management of the plan, and make more prominent the task of protecting basic agricultural land and the environment, etc. This is a normal continuation of the trajectory of spatial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times, the key tasks of spatial planning should shift accordingly. For the changes in the planning industry, the inherent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have been basically kept, and they have all proved to be effective in practice. The advan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iginal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will be inherited, carried forward and expanded.

From Referencing Foreign Blueprints Towards Tackling China's Unique Urban-Rural Problems

Text/ SIMA Xiao **Edit/** DING Xinyi[UCRC]

Th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is the inheritance and integration of the existing spatial planning, and will certainly continue the "genes"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Regardles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planning system, the basic principles,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of planning such as respecting the rules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dhering to the people-oriented approach, unifying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maintaining justice and fairness in the allocation of spatial resources,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will remain unchanged, and the techniques and methods on which the discipline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has been developed over the past decades will continue to evolve with the times. As a "testing field" fo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Shenzhen's early planning for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 was based on the socialist perspective of exploring planning methods under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and later on it established an updated planning and institutional system based on its own development trajectory and policy scenarios, drawing on foreign experience. From the history of Shenzhen's planning development, zoning has always been the core of spatial governance.

The Impact of Urban Planning Transformation on County-level Planning

Oral Account/ HUANG Xiangqiu **Interview/** DING Xinyi[UCRC]
Edit/ ZHAO Min

The traditional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puts too much emphasis on the technical logic and neglects the policy logic, and the systematic and rigorous technical system is too complicated and specialized. The field is too concerned with the preparation of plans and neglects the tradition of implementation. Constrained by technology and tradition, it has not been able to achieve the real meaning of global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 The current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is results-driven, that is, planning should be practical and useful, which has been the weakness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To improve this, we need to promote the strengths of strategic,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and learn from the precision, consistency and execution of land use planning. Planners need to put their heads down, forget about the "city-building" era, and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inventory planning era. They should return to the spirit of craftsmanship, solidly "Make little plans", and diligently serve the public.

The Impact of Capital Integration on Private Urban Planning Companies

Oral Account/ TANG Xiwen **Edit/** DING Xinyi[UCRC]

China's urban master planning system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s influence during the command economy era. With the gradual stabiliz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urban master planning in urban expansion has declined, which also shows the meaning of bottom-line and controllable thinking in the reform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The planning industry has not reduced its business, but the spatial scale of planning has shrunk. The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has improved, and the work will be moving more and more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embroidery". The importance of the planner's role is decreasing, and the technical authority and the voice of technology are weakening. In recent years, the

decline in 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design fees is actually related to the decline in the technical authority of planning, which is completely a market behavior based on supply and demand. Under the current transformation of the planning industry, private planning institutes have been greatly affected, firstly, by the lack of technical means which traditional planning institutes fail to provide; secondly, by the integration of capital, as some private planning and design companies have been gradually acquired by big corporations with massive capital coverage.

Embracing the Era of Urban Operation: The Second Entrepreneurship of a Listed Planning Company

Oral Account/ WANG Fuhai **Interview+Edit/** DING Xinyi[UCRC]

In the era of inventory space regeneration, urban development is shifting to the theme of operations. Urban planning ideology, technical capabilities, service content, and the way it functions are all changing. Planning used to be more like a health consultant, but urban operation requires a clinician who takes more action elements into account to make planning more implementable. Planning used to emphasize solutions in spatial construction, but urban operations require comprehensive consulting services that provide a package of solutions and action recommendations for operational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rving urban operations, going public may be a legitimate choice for planning companies to continue their autonomy, and they can use the power of technology to get rid of the shackles of customized businesses. In particular, many emerging instrumental needs in the field of urban planning nowadays are offer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business expansion of planning and design companies after going public.

International Planning and Design Enterprises in China: Embracing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lanning Transformation

Oral Account/ LIU Hongzhi **Interview/** DING Xinyi[UCRC]

In the process of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s, international planning and design companies have effectively formed synergy with domestic organizations of planning preparation in terms of planning concepts, design decisions, and technical applications. The benefits of collaboration are clearly manifested in many Sino-foreign joint planning and design projects. In the view of international planning and design firms, domestic planning development in China is gradually becoming more integrated with international planning concepts, and there is room for continued expansion of the ways and contents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in the future. The "advanced concepts" from international sources under specific time and space conditions must also be more embedded in or generate constructive dialogues with domestic urban development conditions. This will significantly alter the perspectives and the choices of technical tools for urban planning in China, and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urban planning that adapt to local conditions.

Prospect on Informatization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Oral Account/ SU Leping+Zhang Yunyi
Interview/ DING Xinyi[UCRC]+SHAN Bingqin

The informatization of China's planning industry started in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Before 2000, it was the starting and preparation stage of planning informatization, and some pioneer coastal cities went through the stages of Urba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UGIS) and comprehensive office automation (OA) successivel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process of planning informatization accelerated significantly and gradually entered the business modeling and model-driven stage with the approval management business as the core. During 2011-2016, the informatization of the planning industry entered a service-oriented (SOA) stage. From 2016 to the present, driven by the new generation of IT technology, the planning industry entered the era of comprehensi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2018, the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was established, which proposed to establish a "one map"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on a unified basic information platform, and to incorporate information systems into the results submission of the new round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t present, the informatizatio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lanning industry, the reform of planning and natural resources institutions, and the prepa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new round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overlap and promote each other. Over the past 20 years, informatization has played a supporting and promoting role in the reform "to delegate power, streamline administration, and optimize government services" in planning management departments, and also forced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s to improve their informatization.

Landscape Planning Should Take the Lead in Practice Innovation with the Expertise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Oral Account/ LI Dihua **Interview+Edit/** SHAN Bingqin

Under the new round of planning transformation arou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landscape planning", as an alias of "spatial planning", should take up a more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The major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should shift to the field of urban and regional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public policy research on the basis of past studies. At present, the roles of landscape planning and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in China are misaligned, and there are serious shortcomings in the corresponding talent training, resulting in severe talent challeng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erms of transforming th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will continue to enrich and clarify the knowledge system,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needed for spatial planning,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void excessive concern for the expression of planning results, thus ignoring the content of planning results and the nature of public policies that adapt to local conditions. Landscape planning should be given a broader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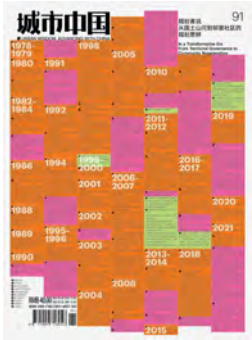
Community Planning as an Extension of Traditional Urban Design

Oral Account/ TANG Yan **Interview+Edit/** DING Xinyi[UCRC]+ZHAO Min

Professionals in architecture, planning, and landscape are all involved in urban design. Urban design work varies by scale, including regions, cities, districts and even buildings. The key point is whether to understand and promote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and dimension of the "city".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work at the community level covers various contents, and is often manifested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urban design

at the community level, as "community planning" and "community design" should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and area of expansion for urban design. "Guide-based" urban design can provide the rules, practices and requirements needed for community building, and form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scale projects. "Process-based" urban design focuses on specific construction and community discussion, and the design is finalized through public participation, working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ocial mobilization. "Implementation-oriented" urban design is a common approach of community design service, where planners and designers propose problem-solving methods, technical measures and design solutions.

In the process of top-down transmission of the "one blueprint" for urban construction, we should promote the systematic implementation of grassroots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at the community level, and use good "design" to create a quality built environment at the "last mile". Since community work is relatively nuanced, in many cases it requires "micro-acupuncture" within the overall framework and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city, leading to growing integration in technical skills and implementation of planning, design and landscape in the community. The clear professional and work boundaries of the past are blurring, and the new trend is to promote community renewal through a "hybrid" design process and design team.



城市中国

Urban China

规划者说
从国土山河到邻里社区的
规划思辨
In a Transformative Era
From Territorial
Governance to Community
Regeneration

总第 91 期

网本期课题组

[课题统筹] 谭健宁
[课题主持] 丁馨怡
[责编统筹] 谭健宁
[美术设计] 七月合作社
[课题组成员] 赵忭 李娟 袁菁 山冰沁
[封面设计] 七月合作社

[主 管] 中国出版集团
[主 办]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出 版] 中国出版期刊中心
[协 办]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院
上海华都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上海城道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国内顾问] 邹德慈 (中规院) 柯焕章 (北规院) 吴志强 (同济大学)
阮仪三 (同济大学) 诸大建 (同济大学) 姜永琪 (同济大学)
孙施文 (同济大学) 汤惟杰 (同济大学) 张松 (同济大学)
朱锡金 (同济大学) 张闳 (同济大学) 李翔宁 (同济大学)
刘家琨 (家琨建筑) 史建 (一石文化)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
袁奇峰 (中山大学) 张兵 (中规院) 周榕 (清华大学)
周俭 (同济规划院) 邹兵 (深圳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
王富海 (深圳)

[国际顾问] 瑞姆·库哈斯 (OMA-AMO) 马清运 (马达思班/南加州大学)

[编 委 会] 顾敏琛 匡晓明
[总 编 审] 萧歌
[总 编 辑] 匡晓明
[总 监 制] 杨偲
[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李娟 崔国 黄正疆 丁馨怡 宋代伦 杨松飞
唐菲 张晶轩

[主任编辑] 谭健宁
[文字编辑] 袁菁 山冰沁 周艺娴
[摄 影] 朱迪
[市场主管] 崔国
[网络主管] 盛刘申
[出版项目经理] 屠茜

[特约观察员] 李雨菲 (剑桥大学) 李秀政 (UCL) 王曼琦 (UCL) 董心悦 (曼彻斯特大学) 王正丰 (都柏林大学) 邹琳 (海德堡大学) 熊志嘉 (ETH)
刘艾 (多伦多大学) 张威 (新加坡国立大学) 王婷 (香港大学) 孙聪 (深圳大学) 杨辰 (同济大学) 刘杰尘 (中国传媒大学) 李正东 (宁波大学)
庞思吟 (上海) 王超逸 (深圳) 李康 (深圳) 朱静宜 (伦敦) 司维 (巴黎)
赵璟韞 (香港) 邓菲 (北京) 张天娇 (波士顿) Harry den Hartog (荷兰)

[特约编辑] 周详 (东南大学) 严娟 (同济大学) 倪瑜遥 (澳门大学)
金怡菲 (武汉) 张超 (武汉土地利用和城市空间规划研究中心)

[合作课题组]
国家信息中心综合研究部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遗产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 上海市政府法制办公室 /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 上海社科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 / 荷兰动态城市基金会 / 法国动态城市基金会 / 德国技术合作公司 / 深圳双年展 / 威尼斯双年展 / 卡塞尔文献展 / 台湾大学城乡研究所 / 荷兰新城研究所 / 中法建筑交流学会 / 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建筑研究中心 / ADU 管理咨询公司

[智慧资源] 北京大学 / 复旦大学 / 华东师范大学 / 东南大学 / 同济大学 / 中山大学 / 南京大学 / 武汉大学 / 重庆大学 / 香港大学 / 香港城市大学 / 香港中文大学 / 哈佛大学 / 麻省理工学院 / 伦敦 AA 学院 / 伦敦政经学院 / 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学院 / 伦敦大学金史密士学院 / 英国诺丁汉大学 / 宾夕法尼亚大学 / 哥伦比亚大学 / 加利福尼亚大学 / 威斯康辛大学 / 南加州大学 / 东京大学 / 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 / 柏林工业大学 / 纽伦堡大学 / 魏玛包豪斯大学 / 巴塞罗那建筑学院 / 哥本哈根大学 / 巴黎政治学院 /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 海德堡大学 / 贝尔拉格学院 / 瑞士苏黎世工业大学 / 新德里大学 / 印度孟买 KRVI 建筑学院 / 新加坡国立大学

[营运机构] 上海华都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上海市杨浦区中山北二路 1121 号同济科技大厦 7 楼 (200092)
[电 话] 8621-65982080
[传 真] 8621-65982079
[发 行 部] 上海 汪晓霞 021-65982080-8032

ISSN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9-7163
CN 国内统一刊号: CN 11-4557/G0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京朝工商广字 D8041 号

RMB 40 / HKD 60
USD 20 / EUR 15
GBP 12

出版日期: 2022年5月

[Authorities in Charge] China Publishing Group
[Sponsor] China Translation&Publishing Corporation
[Publishing] The Center of China Periodical Press
[Associate Sponsors] Shanghai Tongji Urban Planning Design Institute
Shanghai HuaDu Architecture & Urban Design CO.,LTD.
Uban China Research Center (UCRC)
Shanghai Chengdao Properties Consultancy LTD.

[Domestic Advisors]
Zou Deci(China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 Design)
Ke Huanzhang(Beijing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 Design)
Wu Zhiqiang(Tongji University) Ruan Yisan(Tongji University)
Sun Shiwen(Tongji University) Tang Weijie(Tongji University)
Zhang Song(Tongji University) Zhu Xijin(Tongji University)
Zhang Hong(Tongji University) Liu Xiangning(Tongji University)
Liu Jiakun (JiaKun Architecture) Shi Jian (IS-Reading Culture)
Wang Fuhai (Shenzhen)
Yuan Qife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ang Bing (China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 Design)
Zhou Rong (Qinghua University)
Zhou Jian(Shanghai Tongji Urban Planning & Design Institute)
Zou Bing (Shenzhen Urban Planning & Land Resource Research Center)
Lu Ming(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Advisors] Rem Koolhaas (OMA-AMO)
Ma Qingyun (MADASpam/USA)

[Editorial Committee] Gu Minchen Kuang Xiaoming
[Senior Editor] Xiao Ge
[General Editor] Kuang Xiaoming
[Supervisor] Yang Cai
[Urban China Research Centre]
Huang Zhengli Ding Xinyi Li Juan Cui Guo Yang Songfei Song Dailun Pan Ye Tang Fei Song Yating
[Editorial Director] Tan Jianing
[Text Editors] Tong Xin Yuan Jing Zhao Min Chen Chen
[Photographer] Zhu Di
[Marketing Administrator] Cui Guo
[Network Administrator] Sheng Liushen
[Publishing Project Manager] Tu Han

[Project Cooperators] Comprehensiv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State Information Center \ World Heritage training and Research Center of UNESCO Asia-Pacific Heritage Area\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hinese Research Academy of Environment Sciences\Reform and Development Center of City and small town of the Stat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Shanghai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Legal Affairs Office of Shanghai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SIFL Institute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Centre for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of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olland Dynamic City Foundation\French Dynamic City Foundation\German Technical Cooperation\Shenzhen Biennale\Venice Biennale\Kassel Documenta \Institute of urban and rural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Institute of Holland New Town Research \Sino French architecture Exchange Association \ Beijing architecture research center, Columbia University\ADU Consulting

[Management] Shanghai Huadu Advertising and Media Company
[Add] 7th Floor, Tongj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ilding, No.1121 Zhongshan North-2 Road, Yangpu District, Shanghai (200092)
[Tel] 8621-65982080
[Fax] 8621-65982079
[Circulation Manager]
Shang Hai: Wang Xiaoxia 021-65982080-8032

ISSN: ISSN 1009-7163
CN: CN 11-4557/G0



《城市中国》 iPad新版APP



继续寻找与纸刊、微信之间的传播矩阵平衡
APP平台将作为唯一渠道，
推出部分文章完整英文版，以飨海外读者
同时将不定期推出特别策划的别册内容，
与微信独家策划主题呼应

[版权声明] 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地图、光盘等资料的版权归中国出版期刊中心所有，凡未经授权以任何方式转载、复制、翻印及传播，本刊将保留一切法律追究的权利。
[特别声明] 本刊刊载的作者言论并不代表本刊观点。



上海华都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二路1111号 同济规划大厦7-8楼 电话: 86-21-65975399
传真: 86-21-65975766 e-mail: huadu@vip.sina.com www.hdd-group.com